

CAH/02/11

## 目 录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	1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 .....	131
在日苏两党举行会谈以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三封复信 .....	138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的复信 .....	138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 .....	140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复信 .....	144

#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 来信的复信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答复了它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现在发表这封信的全文。另外，本报还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单方面地公布了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的信件。我们是把它作为一项资料发表的，目的是让全体党员和党的支持者正确地理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的内容。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赤旗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我们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已经通知你们说，我们正在准备答复你们四月十八日的那封很长的信。现在我们提出答复。

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基本态度，就象你们所了解的那样，最近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赤旗报》根据七中全会决定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社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召开各国

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等文件中表明了。

在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和不团结现象已经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党一贯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作为对日本革命负责的独立自主的党，并且从正确地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真正的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的立场出发，要努力按照我们党的纲领来推进日本的革命运动，同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团结，作出积极的贡献。

众所周知，无论在一九六一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时候，或者在自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一系列兄弟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兄弟党的时候，或者在发生中印边界争端和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我们党都一直是坚持莫斯科宣言与莫斯科声明的基本方针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一立场出发，有原则地而又自主地、并且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审慎地采取了行动。

我们对发展反对以“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国际共同斗争是一贯重视的，并且为此作了积极的努力。

莫斯科声明指出，必须坚持不懈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使群众既不对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也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我们党一直就是以此作为指南的。

而且，就象我们党从一九五八年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直到现在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一贯地重视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思想斗争，同时不

不屈不挠地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为了及时克服现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任何细微的表现而进行了努力。

虽然在这封信中只提出一些基本事实，但是，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党一直严格地坚持了忠实地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这种态度。

正象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党成立的时候起到最近时期止，我们党同苏联共产党一直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在专制主义天皇制度的野蛮统治下的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党抵抗一切镇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干涉，一直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且，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下的战后时期，我们党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精神，一直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所有的人民群众为争取人类进步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即使在你们党之间发生了可能影响两党同志般团结的问题的情况下，也决没有采取立即向你们公开提出问题或者公开进行指责的那种态度，而遵守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总是审慎地加以考虑，以期在内部解决问题。

但是，你们不想遵守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自去年以来，对我们党发动公开的攻击，而且再三地进行了这种攻击。这就是说，你们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开始发表了尤·茹科夫同志写的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广岛的呼声》，今年五月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等人刚一开头公然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你们就立即通过《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表示全面地支持这些叛徒，对我们党进行了系统的攻击。而且，你们在今年七月，采取了粗暴的做法，即突然单方面地公布了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而这封信牵涉到双方曾经商定不予公开的、在今年三月上旬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谈的内容；这封信歪曲我们党的决定和我们党代表团的发言，对我们党进行严重的指责，说什么我们党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脱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路线，等等。

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完全不顾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也就不能不公布对你们七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并且公开答复茹科夫同志在大约一年以前进行的攻击以及“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其他方面就志贺等人背叛问题进行的诬蔑，这是极其自然的。而且，为了反驳你们对于日苏两党会谈前发生的事情经过的片面歪曲，我们党不得不公布我们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全部责任，当然必须由你们来承担。

你们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大体上包括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原面和经过、日苏两党会谈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和平共处政策、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等理论问题和关于恢复两党正常关系的问题等。

下面，就这些问题分别谈谈我们的看法。

还有，你们已经公布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的信，并且通过塔斯社把这封信的日文译本广泛地散发到日本国内。志贺义雄一伙和內藤知周一伙等叛徒、修正主义者办的报纸以及商业性杂志和其他报刊，都全文登载了这封信。因此，我们现在通知你们，我们当

然也要公布这封复信。

你們在七月十一日的来信中就公布这两封信的理由說：“在日本共产党领导……甚至认为沒有必要答复我們的信件的目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再使党对已經形成的局势毫无所知，决定公布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給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这一封信。”如果你們的目的是要把两党关系的真实情况告訴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那么，我們希望你們拿出勇气来，也公布我們党的这封对你們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我們确信，这样做对于根据事实来探求真理，是会大有帮助的。

### (一)

首先，从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这个问题談起。

你們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說，日苏两党的关系之所以恶化，是因为我們党的领导方面“背离了党以前的決議，而执行一种新的方針”，“这种方針……指望引起日本共产党员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信任和敌視，破坏日苏傳統的友好关系，使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发生爭吵”，并且提出了种种“論据”。

你們提出的所謂我們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我們党方面，这种說法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如果先从結論說起，那么，我們的結論就是：日苏两党間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第一，你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单方面地挑起了公开論战，并且要求我們党在这场論战中毫无批判地追隨你們；第二，你們对于我們党的这种不接受你們的无理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的态度沉不住气了，因而

反复对我们党进行了指名攻击、无理干涉内部事务和捣乱等等。根据日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是不容怀疑而且一清二楚的。

而且，研究一下你们所列举的“论据”，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你们当做日本共产党破坏莫斯科声明的规定、开始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的“论据”而提出的是，我们党的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和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问题的文件。

在答复这个指责之前，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是怎样挑起来的？挑起公开论战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在一九六〇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粗暴地践踏这次会议的声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公开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甚至说什么“公开呼吁寻求一条克服已经发生的意见分歧的道路，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就意味着鼓励他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反对列宁主义的行动”，企图使这种粗暴的做法正当化。在这以后，在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东欧和西欧的一系列党代表大会上，这种公开的攻击还扩大到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你们指责的兄弟党答复这种指责，这是独立平等的党当然的权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就是这样挑起的。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在粗暴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单方面地发动了对兄弟党的公开攻击的你们方面。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历史事实。

而且，公开論战既然已經开始，我国的反动势力正在进行着广泛的宣传和誣蔑，以便利用这场論战进行新的攻击来反对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我們党采取措施，自主地介紹論战所涉及的問題，使全体党员能够广泛地研究这些問題，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在这个时候，采取什么方式介紹这些文件，这始終是应当由我們党自主地决定的問題，外国的兄弟党领导方面根本无权提出要求。而且，应当对挑起目前的公开論战这件事情負責的你們，更是沒有資格指責我們党，說什么对介紹論战文件的方法不能令人滿意。

根据上述基本前提，具体地逐一地研究一下你們的說法吧。

(1) 你們首先借口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党的国际資料杂志《世界政治資料》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亞的問題》專輯，登載了阿尔巴尼亞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維尔·霍查同志回答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领导方面进行的攻击的演說，而对我們进行了指責。

但是，因为正是你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对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领导方面公然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个問題因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問題，所以我們党才不得不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亞的問題》專輯。

以野坂主席为团长的、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們党代表团，沒有参加你們組織的指責阿尔巴尼亞劳动党的运动。这是因为你們的行徑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的。而且因为，如果我們不去亲自充分了解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领导方面的立場和观点，力求根据事实客观地弄清真相，就輕率地作出結論，那不是尊重真理的共产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按照你們的来信的說法，我們党似乎是只发表了阿尔巴尼亞劳动党方面的資料。但是，我們党早在出版《关于阿尔巴尼亞的問



題》專輯以前，就发表了包括指責、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領導方面的部分在內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而且，就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問題》專輯里面，还登載了你們指責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三篇、支持你們观点的兄弟党領導人的发言和文章九篇，与此同时发表的是恩維尔·霍查同志答复你們的指責的演說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的社論一篇。

根据我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的决定发表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赤旗报》社論，就這個問題，作了如下的說明：

“商业性报纸、杂志和春日庄次郎一伙的文件根据已經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文件，提出這個問題，并且利用這個問題来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和誣蔑我們党的今天，我們党作为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負責的政党，将会采取指施，譬如出版有关文件等等，以便党员和支持党的人士能够更加广泛地研究公开发表的、同這個問題有关的文件。”

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問題》專輯編者的按語中也曾說过同样的話。

一九六二年春天，尤·茹科夫同志来到日本的时候，曾經提出這個問題，指責我們党。我們党的領導方面当时就曾經明确地說明了我們党的上述立場，拒絕了你們的无理要求。以后，一九六二年年底，袴田同志路过莫斯科的时候，你們又提出同样的問題，袴田同志再次說明了我們党的立場。

总之，你們是执意要求我們党只发表闡述苏联共产党領導方面的立場和观点的文件以及支持你們的立場和观点的兄弟党領導方面的文件，千方百計地想要强迫我們党接受这个要求。你們以我們党发表了反对你們的立場和观点的兄弟党的文件为理由，指

實我們黨。但是，實事求是，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科學態度。不言而喻，這種科學態度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充分研究論戰雙方的立場和觀點。

我們黨不參加蘇聯共產黨領導方面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運動，而公开发表雙方的文件以便全體黨員和黨的支持者能够广泛地研究這個問題，這只能證明我們黨忠實於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關於兄弟黨關係的準則，只能證明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依據的獨立自主的態度。我國有句俗語說，“無理行得通，道理就无影无踪。”我們黨過去堅決沒有讓自己屈從你們的蠻橫要求而拋棄真理，今後也絕對不會那樣做。

(2) 你們接着說，“日本共產黨的報刊上，一貫不理睬蘇聯共產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言論”。但是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凡是系統地閱讀過我們黨的文件的人，都完全了解這種情況。

本來，我們黨的報刊如何處理國際上爭論中的問題，這是要由我們黨自行決定的事情，而不是你們可以說三道四的問題。然而，你們自己在你們國內究黨是怎樣處理國際上爭論中的問題的呢？

在蘇聯，如所周知，除了象公布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這種極少的例外情況之外，只發表了蘇聯共產黨的观点和同意這種观点的兄弟黨的观点。而且，你們甚至在引用論戰對方的观点的時候，也几乎总是歪曲對方的論點。蘇聯共產黨的報刊，就是从兩黨舉行會談的時候來看，在那很久以前就已經不登載日本共產黨的決議和聲明了。我們黨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文章，才真正是長期被你們“一貫不理睬”。不仅如此，你們不是甚至阻撓居留蘇聯的日本共產黨員閱讀我們黨機關報《赤旗報》，有時還扣押登載了使

你們感到不快的消息的那些期的報紙嗎？最近你們不是禁止通过书店供应一般讀者的《赤旗报》进口嗎？你們不是对帝国主义的報紙，而是对兄弟党的報紙，采取了这种做法。

因此，不了解日本共产党文件的苏联共产党員和苏联一般公民，也許会相信你們所謂日本共产党领导方面“‘一贯不理睬’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的言論”这种毫无根据的說法。但是，在日本了解我們党广泛地介紹了国际論战文件的情况的許多人，听到你們这种极端无理の說法，只有感到惊讶而已。

你們抱怨說什么《赤旗报》只登載苏联共产党文章的摘要，說什么发表的时间太晚。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赤旗报》沒有义务、也沒有必要立即全文登載你們发表的文章。况且你們自己一贯不提我們党的決議和重要文章，更是根本沒有权利要求我們党这样做。

不过，尽管你們很久以来就已經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而我們迄今为止，却通过《赤旗报》、《世界政治資料》等报刊，总的說来是广泛地介紹了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問題的觀點。讓我們举几个简单的数字：仅以《赤旗报》报道你們的文章、你們的觀點和立場的消息來說，一九六二年一年間就登載了二百四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条；一九六三年一年間登載了二百五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一条。此外，《世界政治資料》一九六二年轉載过你們的文章、声明和演說等七十五篇，一九六三年也轉載了六十八篇。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明显地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的行动以后，特別是在對我們党开始公开攻击以后，我們在处理你們的文章和消息的时候，一直采取了当然應該采取的批判态度。但是，这方面的責任不在于我們，而在于你們。尽管如此，在《世界政治資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論战主要問題》中，我們仍然系統地介紹了你們的基本

立場和观点。这是因为我們从教育党员方面考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3) 你們还从我們党在《世界政治資料》等报刊中轉載的兄弟党文章中，找出“分裂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修正主义者”等等字眼，就作出武断的結論說：“日本共产党领导中却有人正是认为可以在党的刊物上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这种粗暴的侮辱。”

但是，我們党的报刊轉載的兄弟党文件怎样說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和我們党怎样說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这分明是两回事。这是不值得加以解释的非常明显的事情。你們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給其他兄弟党打上烙印：什么“指望为博得享受帝国主义的施舍的权利而准备条件”，什么“血腥暴行”，什么“新托洛茨基分子”，什么“教条主义”，什么“民族主义者”，什么“好战分子”。我們党的报刊，也照样轉載了苏联共产党使用了这种語言的报告和文章，可是我們党并没有因此而接到被你們痛罵的兄弟党的抗議。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論战的内容就包含有这种指責的語言，所以，借口包含有这种指責的語言而攻击轉載者，显然是不恰当的。

关于这一点，你們却在信中反問說：“如果在苏联共产党报纸上把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修正主义者’，他們将作何反应？”但是你們在这同一封信中，就对我們党进行种种辱罵，說什么“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违背工人阶级的意識形态——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主张热核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应声虫”，甚至单方面地公开发表了这封信。这种攻击方式，是你們迄今为止反复使用的老一套手法。你們甚至要求我們党“停止”轉載那些反駁苏联共产党领导方

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可是自己却又同时对我們党公然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誣蔑性的指責。你們的这种做法正是完全不顾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独立平等的权利，为自己要求特权地位。

(4) 你們还借口《世界政治資料》介紹了巴西、澳大利亚、錫兰、比利时等国的“分裂主义者”的文件，攻击我們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是刊载了双方的文件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党发生分裂，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原則問題的論战有关，我們自己有必要根据事实，加以充分研究。

你們甚至責备国际資料杂志《世界政治資料》同时介紹了这些国家的党原有領導方面的观点和分离出来的党的領導方面的观点。但是，你們对于我們党，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你們唆使志賀和鈴木等人對我們党进行破坏活动，《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长篇累牘地介紹受到我們党正式开除党籍处分的他們的声明和报纸，公开加以支持，但是对于我們党的、包括决定处分志賀和鈴木等人的八中全会決議在內的文件，却完全不予理睬，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嗎？你們竟然敢于干出这种勾当，那就更沒有資格来對我們党提出抗議了。

就象在前面清楚地看到的那樣，你們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論战文件的介紹問題所作的指責，归根結底，就是要求我們党只发表苏联共产党領導方面的和支持它的观点的兄弟党領導方面的文件，而不要发表因受到你們攻击而进行反駁的其他兄弟党領導方面的一切文件。你們自己首先违反莫斯科声明，攻击一系列的兄弟党，挑起公开論战，同时还要求其他兄弟党只发表公开論战的一方的文件，这种做法，就是要求其他兄弟党毫无批判地追随你們走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道路，这正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团结原则毫不相容的大国主义态度。为了使这种无理要求“合理化”，你们断言，反驳了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里面“没有一点真理”，“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进行论战的文件”；你们甚至还說，日本共产党的报刊转载这样的文件——用你们的话來說就是所謂“反苏的誹謗性文章”——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行为”。

根据这种断定和說法，能作出什么样的結論呢？从这里得出的結論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一切言行，总之都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公开指責和攻击其他兄弟党不算是违背莫斯科声明，而其他兄弟党加以反驳就是践踏莫斯科声明；就連我們党的报刊转载其他兄弟党回答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指責的文件，也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行为”。这就是說，只要問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立場、观点不一致，就是“没有一点真理”，就是违背莫斯科声明。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的思想。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陣营不团结状况的最大原因，正是你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以及从这种思想出发明目张胆地发动的对兄弟党的粗暴干涉和攻击。

第二，你们大肆批評我們党对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采取自主的批判态度，把这个行动作为我們党的所謂“反苏态度”的又一个证据提出来。在你们的信里是这样說的：

“日本共产党某些领导人不止于別有用心地轉載中国的和其他人的反苏材料，最近还积极附和了猖狂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人。

自从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声明怀疑苏联政府签订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图的正确性和真诚性以来，日本共产党领导就不断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

在莫斯科日苏两党会谈上，你们又抓住我们党的政治局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的声明，指责了我们党。政治局的这项声明，即《必须举起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维护统一》，是表明我们党对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态度的。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声明揭露了签订这个条约的美帝国主义的意图，同时，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目前存在着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的情况，为了争取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表示反对把支持或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议强加给世界大会。但是，根据你们的说法，这个声明是公开地践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准则的。你们甚至作出极端的论断说，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项声明，事先没有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协商，就攻击了苏联的政策，因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党内问题进行了粗暴的干涉，践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的原则。

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我们要专作一项，对你们的说法进行详细的反驳。我们现在在这里只是要指出，你们偷梁换柱地转移问题而把责任推给我们党这样一件重要的事实。

根据你们的说法，似乎是由于我们党没有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结果日苏两党间的关系就恶化了。但是，这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完全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见解，是颠倒黑白的武断。

众所周知，历史的经过是这样的：

你们在去年七月事先没有向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作任何说明，就突然赞成你们自己过去在原则上一直

反对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而且还硬要其他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接受这个条約，并且开始攻击不接受这个条約的人。正是你們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問題上的这个大轉弯，成了助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內部不团結的新的、重大的因素，成了使你們党和我們党的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我們党分析了有关締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情况，自主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这样做是非常自然的，絲毫沒有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則。因为正如我們党的七中全会的決議所明确地指出的那样，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問題，第一，既然是“采取要求各国政府都参加的原則，根据这个原則，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和签署的态度”，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国际問題，而且也是我們国家的国内問題”；第二，既然美国政府是“条約的当事者之一”，那么，这个条約对日本人民來說，就是关系到对日本人民直接斗争的对象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問題；第三，既然“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都散布他們对这个問題的观点，正在把这个問題作为‘測驗的工具’来分裂群众运动”，那么，在同群众运动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当中，对这个問題也不能擱置不問。七中全会的決議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党从希望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立場出发，对于这个问题一直表明自主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們党的責任和义务。”

因此，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問題，不仅對我們党來說是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对各国兄弟党來說，也会給它們带来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你們却不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进行任何商談，就片面地改变了直至当时为止大家一致公认的路綫，来一个大轉弯，簽訂



了这个条约。你们以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自由为借口，企图使这件事情“合理化”，进而说不同意签订这个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攻击了苏联，而对它们进行恶意的指责。在这封信里，你们也把我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表明了自主的看法这个行动，看作是“积极附和了猖狂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人”的标志。但是，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你们从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变为赞成这个条约，这又是什么标志呢？这等于“积极附和了”曾经从正面反对苏联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的人。

而且，我们党虽然知道，苏联政府放弃一向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方针转而参加这项条约这个大转弯包含着决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使群众理解局势的实质的工作就会发生困难，但是，我们党从照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立场出发，一直避免对于你们负全部责任的苏联政府的态度，提出直接的批评。

但是，尽管我们党作了这样慎重的照顾，正如在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发表了尤·茹科夫同志公然指名指责我们党的文章《广岛的呼声》，你们从此开始，为了硬要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一直加紧进行无理的攻击和干涉。就是这样，你们自己先使日苏两党间的关系恶化了，反而搬出八月三日我们党的政治局的声明《必须举起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维护统一》来，把你们应该负的、使两党关系恶化的重大责任推给我们党。我们必须说，这是在忠诚老实的共产党人中间不能容许的态度。

第三，你们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赤旗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说什么“在这篇彻头彻

尾伪造的文章中，对已經經過报纸橫加歪曲的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方針进行了批評”。

但是，这篇文章从维护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反对現代修正主义这个立場出发，批判了圍繞着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評价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人中間出現的修正主义观点——“美帝国主义两翼分化論”和“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論”之类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論，从理論上闡明了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如果你們說你們反对这一篇文章的內容，那么，你們就不應該毫無論据地发出什么“彻头彻尾伪造的文章”之类的謾罵，而應該堂堂正正地从理論上来反駁。这种謾罵不仅絲毫也不意味着你們在理論上正确，而且只能意味着你們自己的不光彩，你們不想認真地从理論上、政治上来进行討論，而不惜只用謾罵和污蔑来代替这种認真的討論。用沒有事实和理論根据的指責来謾罵和威吓，这对我們日本共产党來說，是行不通的。

总之，你們反对我們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爭論中的原則問題独立自主地、积极地发表意見，反对我們党从理論上对各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我們党坚决拒絕这种无理的指責。

第四，你們提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采取禁止在日本散发苏联文件的行政措施”这一点来大做文章。其实，我們只是通知过苏联大使館，要它停止随便向我們党的地方組織寄送指責其他兄弟党的文件。如果我們党把我們有关据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的文件的俄文譯本，不經苏联共产党領導机构的同意，就散发給苏联共产党的地方組織，那么，你們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只要想到这一点，你們也就一定会察觉到你們自己錯了。

你們說，日本共产党东京都委員會有一个部长曾經向日苏协

会的活动家发出指示，要他們停止散发苏联的宣传資料，而散发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你們是根据什么情报这样說的呢？这是非要向你們請教不可的。你們又說什么东京都委员会的《斗争情报》似乎把事情說成是“日苏协会是反党分子的最后的堡垒”，并对此表示不滿。反党分子把日苏协会东京都联合会作为据点，想搞反党活动，这是事实。日本共产党员对反党活动进行斗争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份《斗争情报》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争取“发展友好运动来巩固日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誼”的活动的一个环节提出来的。

你們說，好象我們党把日苏两党之間的意見分歧带进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关系中去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你們自己把日苏两党之間的意見分歧带进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关系中去的。第一，你們为了硬要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策划，而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問題上，日苏两党之間的意見分歧是很明显的。你們所进行的策划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到九月間，以长島又男为团长的日苏协会代表团訪問苏联的时候，你們就对他施加了各种压力，要他在苏日协会方面預先准备好的表示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联合声明上签名。对日苏协会給长島团长的信件，你們甚至非法地采取了启封检查的反常的措施。你們对紧接着訪問苏联的日苏协会青年代表团，也施加了同样的压力。接着，在苏日协会給日苏协会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和十月二十三日的信件上，你們反复地要求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同时，你們还把这些信件直接寄送到全国的县联合会、分会和会员个人等等。第二，你們甚至把同日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完全沒有关系的、指責别的兄弟党的文件，拿到日苏协会去。对你們的这种做法，我們只能认为你們可能是把日苏协会当作苏日协

会在日本的分会，此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且，你们的这种做法同你们以前所采取的对日苏协会的态度，也显然是矛盾的。例如，当一九六一年秋天，苏联恢复核试验时，日苏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日本社会党员的常务理事的提议，决定采取这种态度，即积极地解释苏联政府不得不恢复核试验的理由。那时候你们表明的态度是：日苏协会不应该同这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发生关系。即使从你们自己以前说过的这种准则看来，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们硬要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或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问题带到日苏协会中去，都是不正确的。

日苏协会就苏日协会“要求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作了研究，结果根据常任理事会全体一致的决定，在今年二月八日对苏日协会发出了复文。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在它的复文中，通知说因为日苏协会是“不同思想信仰的各界各阶层的人士组成的，以促进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目的的群众组织”，所以对所提出的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要求，日苏协会决定“不表明本协会的态度，是最为妥当的”。与此同时，另外还附加了一封信，在信中把有关在这个问题的进程中所有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指出“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种政治问题上，一方对他方要求拿出作为协会自己的统一观点来，这对双方的协会都决不会是有利的”。日苏协会采取的这种态度，从日苏协会这个组织的性质、目的来说，是最合情合理的。

如上所述，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正是你们自己在日苏协会的问题上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背离了有关日苏协会及苏日协会的正当的准则。你们的这种做法，使日苏协会的工作陷于困难，允许反党分子及分裂主义者进行阴谋活动。如果你们停止这种做法，那么即使日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上有意见的分歧，日

苏协会和苏日协会也是能够保持团结的。

你们为了证明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对苏联共产党的攻击而举出的事例，尽如上述。正如我们根据事实作了驳斥那样，你们所谓我们党违反莫斯科声明的规定，恶化了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与事实不符的胡说。这种胡说，不过是你們为了掩盖你们使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而硬想出来的口实而已。正如最近两党关系史以事实表明出来的那样，恰恰是你们党对我们党的无理攻击和干涉，才是在我们两党的关系上产生“不良的现象”的最有决定性的原因，其责任也应该全部由你们来承担。

去年七月，你们完全放弃了你们过去的立场，和美英两国政府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党对你们党这种无原则的大转弯，不能毫无批判地跟着你们走。自从这个情况明确了以后，你们党对我们党的无理攻击和干涉，就特别激烈了。我们在这里，从许多事实中，举出迄至两党会谈为止的特别主要的几点：

(1)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事件上，你们同那些为了攻击我们党，分裂并破坏群众运动而进行活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互相提携，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我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统一的活动。

这几年来，社会党及总评的一部分右翼领导人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一方面拿“分裂”来吓唬人，一方面却把回避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方针，强加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并为此而拼命活动，这也是你们十分清楚的。事实上，在前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你们的代表团同占有压倒多数的日本代表及外国代表团站在一边，同这个分裂阴谋进行

斗争，共同维护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正确路线。

去年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又面临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一伙的同样的分裂阴谋活动。可是，为出席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访问日本的、以茹科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对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相反地，却同这些分裂主义者相呼应，进行了不利于世界大会的统一团结的活动。这就是说，苏联代表团主张这个大会不作为世界大会而作为日本大会，鼓励原来就有这种企图的一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阴谋活动，甚至还同被我们党开除的、担当一部分分裂阴谋活动的前野良和胜部元等反党修正主义者进行了秘密会谈。

以茹科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想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强加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但是没有得逞。大会闭幕后，当茹科夫同志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我们党的野坂主席提到我们和你们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并建议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会谈中进行讨论。茹科夫同志同意了 this 建议。可是茹科夫同志就在那时起两个星期后，在八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广岛的呼声》的文章，以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没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为理由，批评了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这届大会的决议却是他自己所同意的；同时他指名公开攻击我们党；另外又以所谓支持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表明了对分裂主义者们的“分裂”集会要予以积极评价的态度。

接着，这些分裂主义者，为了建立分裂组织以对抗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行了“关西和平大会”（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日本大会”（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三

十一日)等分裂集会,这时,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等十二分清楚地知道这是沿着分裂主义的路綫而召开的大会,却也发出了支持这些大会的賀电。这些行动旨在阴谋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方面进行国际合作,这在今天,不論让誰来看,都已經是很清楚的事情了。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你們为了使自己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同分裂主义者合作、攻击我們党的这种扰乱活动合理化,竟然开始粗暴地窜改你們本来也承担着部分責任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例如,在苏联代表团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进行这种活动之前,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以前担任《真理报》特派記者的拉蒂謝夫同志的文章《广島在呼吁保卫和平的斗争》。这篇文章讲到上一年即一九六二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时,把情况描述成好象是中国代表的“分裂主义路綫”破坏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这篇文章还替那些从第八届世界大会分离出来的、而且甚至企图想用暴力破坏这次大会的反共分裂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开脫罪名,这就起了鼓励他們进行分裂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阴谋活动的作用。

拉蒂謝夫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所以造成和平保卫者們在去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不得不进行論战的一些困难情况和意見的对立,是由于中国代表們在所謂为和平而斗争这样最迫切的問題上,采取了教条主义的、不合理的态度。中国代表們按照分裂路綫,在大会上竭力使亚非各国的許多代表团和其他所有代表团对立起来……”

拉蒂謝夫同志在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曾以《真理报》特派記者的身分駐在日本,他應該亲眼看到当时要求对苏联的核試驗提出抗議而使大会陷于混乱的,是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

者及总評的右翼领导人所指揮的一小撮日本的分裂主义者。

因为使这次大会陷于混乱的是日本的分裂主义者，这是客观地观察事态的任何人也都不能否定的无可爭辯的事实，所以，以米丁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也在大会閉幕后，发表了声明。苏联代表团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

“社会党与总評的领导机构在世界大会閉幕后，发表声明說大会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一部分外国代表施加了压力的緣故，我們对声明的这种說法也必须讲一句話。这是歪曲事实的。外国代表为了克服大会的混乱，曾表示了准备合作。正如大会的結果所显示的那样，大部分外国代表团的見解是和日本的和平活动家在大会上所代表的占有压倒多数代表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从苏联代表团的这个声明，和一年后以拉蒂謝夫同志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来看，这簡直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可是你們对这究竟作何解释呢？这件事证明，你們为了攻击我們党和中国同志們，又为了以所謂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为理由来鼓励分裂主义者，竟敢不惜篡改历史事实。

(2) 你們还直接地對我們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內部干涉和扰乱活动。

例如，在前面說到的当一九六三年日苏协会代表团訪問苏联时，苏联方面的同志們特別对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做工作，尽管他們知道按照日本共产党的方針办事是党员的义务，却竭力想从日本共产党员那里引出违反党的方針的“个人意見”，也就是引出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意見。一旦这个要求遭到拒絕，你們竟然使用威胁的語調說：“如果你們采取那种态度，那么日苏协会就会分裂，而日本共产党也会分裂。”

还有，派到日本来的《消息报》特派記者契霍宁同志曾煽动我



們党的黨員說，“从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立場出发，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斗争”。契霍宁同志的这种煽动也罢，对日苏协会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威胁也罢，如果说这不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公开的破坏活动，又是什么呢？受到这些煽动和威胁的同志们，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当然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干涉和引诱。但是，并不因为你们的野心未能得逞，你们的具体执行这种煽动和威胁的人以及在背后指使这样做的人就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

另外，自从你们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变得剧烈以来，苏联大使馆就开始对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及工会、民主团体、甚至对党员个人和活动家等，大量地不加区分地寄送指责其他兄弟党的文件等。这种行为，根本没有把我们党的方针放在眼里，是想搞乱我们党的团结的、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的非法干涉，是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甚至带进我国的工会运动及民主运动中的无原则的行动。还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甚至出席了自去年十月起到今年这一段时期中、以背叛我们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修正主义者等为中心的反党分子在若干大学及地方上所组织的集会，并且就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问题作了演讲。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在反党分子以攻击日本共产党、使党脱离群众为目的而组织的集会上演讲，这就是支援了他们的破坏我党的活动。

不仅如此，你们甚至开始阴谋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内，组织违反党的方针的反党小集团。你们于今年三月，一方面在莫斯科参加日苏两党会谈，一方面却通过苏联大使馆等为了在东京促进反党小集团活动，加强了和志贺等人的联系，这一切早已是隐瞒不了的事实了。

你们党的这种做法，是最粗暴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

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准则而向我们党进行的无理攻击，是对我们党的内部问题进行的令人不能容许的干涉，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对你们党向我们党所进行的这种干涉及破坏活动提出正当的抗议时，你们认为这是要苏联大使馆及其他机关停止一切活动，或者是把它们置于日本共产党控制之下，从而拒绝了我们的抗议。这就是说，你们正在想用苏联外交机关有进行活动的自由，或者有推行外交政策的自由之类的口实，使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干涉及破坏活动合法化。但是，只要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末，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了攻击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兄弟党，或者支援反党分子以及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而利用其外交机关，这种事情，随你拿出什么样的借口，也是不能言之成理的。你们经常把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所当然的原则，但是却单单把从内部扰乱别国的兄弟党及别国的民主运动，算作例外，难道你们竟也认为这是属于你们党及国家的应有的权利吗？

## (二)

现在，谈一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以前的经过和会谈内容的问题。你们的来信，在这一点上也歪曲事实，说我们在加紧搞分裂，而你们则为团结而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你们的来信，首先就举行两党会谈以前的经过，作了如下的叙述：

“还在一九六三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曾建议日本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討論我們两党关系中的迫切問題。日共中央在长期沉默并轉載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以后，終于同意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談。”

另外，你們在七月十一日信中說：“在我們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談。”

根据这些信来看，似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負有一种义务，只要接到苏联共产党关于会談的建議，就必須立刻把什么事都放下，跑到莫斯科去。所謂兄弟党之間会的談，必須是不論党的大小或新老，从彼此作为独立平等的党的观点出发，在尊重彼此的情况和立場的基础上召开的。我們党絲毫沒有承担那种单方面的义务，只要你們提出会談的建議，就必須立刻到莫斯科去；如果你們無論如何都需要举行紧急会談，也可以象我們党所提議的那樣，你們可以到东京来。我們不能不指出，在你們的来信中，表現了在兄弟党之間的关系上所不应有的大国主义的态度。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以来，你們在口头上說“在兄弟党里面沒有領導的党和被領導的党”，可是你們的言行很不一致。而且，按照你們的来信的說法，似乎日本共产党的領導人不仅是“在我們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才去莫斯科，而且在这一年期間裝出完全沒有这回事的样子。然而，这完全是抹煞历史事实的胡說。关于这一期間的經過情形，在为了說明真相而发表的我們党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已經作了清楚的說明。

我們在三月六日的复信中，对两党会談原則上表示贊成，并就我們不能立刻答复会談時間等問題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說明：

“我国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底的期間，举行各級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發生的問題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

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們还預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我們考虑到我們党所面临的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做完四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們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問題，向你們提出关于这个問題的具体答复。”

关于日苏两党会谈，我們接到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第二次提出的建議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旬。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在这期間，你們突然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就此开始向我們党发动了露骨的攻击和干涉。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仍然坚持要依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則，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意見分歧。关于这一点，我們在十月二十二日答你們十月十二日来信的复信中，說得很清楚。我們在这封复信中，再一次以同志式的态度把后来我們党的情况作了詳尽說明，并且請你們派代表团来日本。关于这一点，我們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中写道：

“后来，形势轉变，众議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們党就延期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議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們所了解的。

“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間自不用說，就是在直到明年五、六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同，也不可能出国旅行。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們希望你們考虑到，在上述情况下，从我們党的方面來說，目前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內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們派你們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們当然表

示欢迎。”

对此，你们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中，虽然表示原则上赞成派遣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来日本，但又表示担心不能入境。因此，我们为了积极地促成会谈，就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回信中，通知你们说，虽然不能派遣以野坂主席成宫本总书记为团长的代表团，但是正在研究派遣以其他人员组成的代表团的的可能性。没有多久，我们就决定派遣以袴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

以上就是今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以前的经过情形。因此，你们的“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长期沉默以后，终于同意同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这些说法不仅完全不顾这种历史经过，党然抹煞事实，故意歪曲，而且也不是正确地尊重兄弟党关系所应遵循的平等原则的态度。而且，我们只能认为，你们对于我们党正在日本复杂的形势下同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垄断资本不断进行着斗争的情况，完全置之不顾。

你们还极力歪曲地描述了我们的代表团出席两党会谈的态度。我们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谈中，主要就已经在事前的来往信件中不断地交换过意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由此发生的干涉我们党的问题、关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问题以及国际民主运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你们自己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的信中提说：“希望就莫斯科条约的问题和两党所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给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带来了新的困难，你们通过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向我们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你们对我们党进行了无理干涉，恶化了日苏两党的关系，

助长了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因此，我們在这次会談中，首先提出上述問題，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由于我們党的代表团是負有改善我們两党关系的使命而被派到莫斯科去的，所以它当然要首先力求按照原則解决目前两党間发生的具体問題。

我們党的代表团团长，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开始会談时就提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問題，留到經過充分准备之后而召开的国际會議上談，或者留到以后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談中談，而在这次会談中，希望主要就两党間目前发生的問題交換意見。苏联代表团当时並沒有对此提出不聞的意見。

然而，你們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却歪曲会談的內容，說我們党的代表团完全拒絕討論原則性問題。你們在这封信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从一开始以及在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建議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党的相互关系的原則性問題交換意見。但是你們的代表团拒絕討論这些問題。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不是坦率地討論原則性問題，而是把全部努力用于不顾事实地指責苏共‘干涉日共的内部事务’。”

我們党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茹科夫同志公然對我們党进行攻击的問題、苏联大使館人員和特派記者等人對我們党的破坏活动，以及其他一系列干涉我們党内部事务的事实，都是踐踏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关于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准則的原則性問題。我們还可以指出后来你們进行的极其明显而且不能寬恕的活动，你們明目张胆地支持破坏列宁主义的組織原則、公然进行破坏日本共产党的活动的志賀义雄和鈴木市藏。你們难道能够說这不是粗暴地破坏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准則的原則性問題嗎？當我們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和你們会談的时候，你們秘密地加紧进行早在这以前就开始

的同志賀等人的联系，并积极的支持他們的反党活动。这件事证明，我們党的代表团在会談中，特別重視你們干涉我們党的問題，的确是必要和适当的。

我們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观点出发，对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提出了批評意見，这是牵涉到重要的原則性問題的具體問題。

关于国际民主运动問題，我們党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这显然也是原則問題。

你們把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問題都說成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許多抱怨”，这表明，正是你們躲躲閃閃地不願意按照原則来解决具体問題。按你們的說法，归根到底，唯苏联共产党領導之命是从就是有“原則性”，对它提出不同意見就是违反原則的“抱怨”。

还有，你們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企图把我們党的代表团描繪成簡直象是曾經“威嚇”了你們似的。你們的来信說，

“这种努力的真正用意从下面一点也已經暴露了出来：日共代表团提出这些要求时使用了最后通牒的形式，并威嚇要断絕关系。

“袴田里見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就声称：‘双方断絕关系的危险性正在出現’。袴田里見在最后一次会談中說，‘現在我們之間連一致的气味也嗅不到，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断然拒絕簽署关于两党会談的任何联合公报’。”

我們一貫冷靜地研究了你們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的文件。你們的辯論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完全歪曲對方的論点，而且无中生有，然后加以“反駁”。你們描述这次日苏两党会談中我們党代表团的发言，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手法。

袴田同志在第一次发言里，是从“我們对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團結的問題深深感到忧虑”这句话开始，用“我們希望能在真正平等的立場上，以同志式的态度，冷靜地进行会談。我們准

备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充分地倾听你们的意见，而且还要以同志式的态度坦率地说明我们的想法”这句话结束的。

袴田同志在代表团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如果继续不顾对方是独立、平等的党而采取行动，不仅无法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有使双方关系破裂的危险。”他还说：“为了解决我们和你们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团结的问题，希望你们以谦虚的态度作出努力。”

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在最后一次发言中还说：“第一次发言时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次会谈是我们党同苏联共产党之同的第一次会谈。现在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准备今后仍然要花费时间，就两党之间的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耐心地进行协商，以加强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

把你们描述的我们党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的态度和我们的代表的实际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们是歪曲了事实真相。

关于我们党的代表团不赞成起草联合公报的原因，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已经说过，而且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也写过，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出答复。

我们党的代表团所以不赞成发表联合公报，是由于：如果如实地公布会谈的内容，就会把分歧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如果发表与会谈内容不相符合的公报，结果就会欺瞒世界和日本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而且，你们企图强迫我们接受那种内容同会谈的实际情况和你们的实际行动完全不相符合的联合公报草案，里面说什么满意地指出这次交换意见对于促进两党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志式的合作是有益的，说什么苏联共产党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遵守



了列宁的准则，因此，我們才沒有表示贊成。我們党的代表团所以对联合公报問題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正是因为我們考虑到两党应当在原則和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团结，然而你們把这說成是似乎我們不希望日苏两党团结，这种說法完全是不妥当的。

你們在改善两党关系問題上采取的不誠实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你們對我們党代表团在三月会談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特别是你們踐踏兄弟党之間的团结的原則而对我們党内部事务进行了一系列干涉的事实所采取的态度上。如果真心願意改善两党之間的关系，那么这些問題是无论如何也不容許回避的迫切的原則問題。但是，象我們已經說过的那样，你們在两党会談中支吾其詞，回避坦率地按照原則来解决这些具体問題。例如，你們的代表团对于我們指出拉蒂謝夫同志的文章攻击中国代表团并为分裂主义者进行掩护一事沒有回答一句話，一味地提出其他問題来混淆論点，并且顛倒黑白，否认事实，說什么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期間，苏联代表团团员沒有一个人曾經同任何反党分子接触过，什么所謂苏方对日苏协会代表团施加压力等等完全是沒有根据的罪名，又說什么沒有收到关于契霍宁同志煽动反对我們党的反党活动的报告。而且，你們的代表团还强詞夺理地說，在日本的苏联大使館館員的行动屬外交活动的自由，并且摆出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說，各兄弟党有义务經常帮助苏联的各种組織大量散发苏联文件。你們的代表团甚至說，給分裂主义者的“和平大会”賀电是根据列宁关于必須参加“即使是属于反动性质的团体”的各种群众組織的活动的指示，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你們牵强附会地狡辯說，这是根据莫斯科声明，强調共产党要和社会党实行团结，最后甚至突然板起面孔來說什么茹科夫同志的文章中关于

“一些日本共產黨員的立場”的提法倒是太客氣了。就是這樣，你們的代表團根本不想承認你們的錯誤，反而指責我們黨，說我們黨拿這些事情當做問題，只不過是搜集一些最小的、微不足道的“插曲”來說“抱怨話”而已。

然而，在兩黨會談中，我們黨的代表團所指出的你們對我們黨進行干涉和搗亂的事實，決不是微不足道的“插曲”，也決不是偶然的事件，因為我們另外還可以舉出一系列關於對我們黨進行干涉和搗亂的事實。例如，出席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我們黨代表團在莫斯科期間，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要求《赤旗報》駐莫斯科的特派記者告訴他，我們黨代表團里的領導同志之間有些什麼意見分歧，並且囑咐他絕對不要把這事報告我們黨的領導。以為在我們黨的代表團里的領導同志之間，似乎存在着什麼嚴重的意見分歧，這實在是可笑的推測。但是，重要的是，你們想勾引我們黨的《赤旗報》特派記者進行背叛我們黨的間諜活動，搜集便於你們離間我們黨的領導的情報。

當然，我們黨的《赤旗報》特派記者沒有聽從這個無理要求，他把事實報告了我們黨的領導。後來我們黨的領導對於這個決不能忽視的、昭然若揭的破壞我們黨的行為，向你們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可是，你們黨中央委員會的那個工作人員不但沒有對錯誤行為進行自我批評，反而怒氣沖沖地向《赤旗報》特派記者說：“不是曾經囑咐你保密嗎？”這一切經過情形都表明，這個事件決不是那個工作人員的個人行為，而是從那時以來，你們就已經存心要攪亂我們的黨。

你們在今年四月十八日的來信中，仍然繼續採取那種回避解決問題的不誠實的態度。而且，你們這次提出完全違背事實的理由，作為回避這些問題的借口，說什麼在三月的會談中，“蘇聯共產

党代表团在談判过程中对每一个指責都作了詳細的、有根据的答复，指出这些指責不是根据对某些事实的偏頗的解释，就是根本沒有任何根据”，等等。你們在这封信中自夸地說什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貫力求消除我們关系中的、会給我們之間的关系带来即使是微小損失的最小誤会与磨擦”，而实际上你們不但沒有努力消除所謂“最小磨擦”，反而指責我們，說我們认真地想要消除由于你們的責任而产生的这些磨擦的努力是“最后通牒”。

你們用这种不負責任的托詞，規避你們对恶化日苏两党关系的重大責任——你們对遵守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我們党，采用完全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毫不相容的做法，不断非法地干涉內部事务的这个責任，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还有，你們在你們已經单方而发表的这封信中，談到了麦克阿瑟的鎮压——对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职整肃令，使我們党中央处于地下状态时期的有关两党关系的各項問題。这种做法，不仅完全无视两党代表团决定不公布这次会談內容的協議，而且完全破坏了在反动势力面前不能毫无戒备地談論兄弟党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时期的不公開的問題这样一种兄弟党之間的信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所当然的准則。我們不能同意你們就這個問題所談的內容，但是，在这封公开发表的信里，就这个时期的这些問題深入地討論是不妥当的，因此，我們认为根本沒有在这里提出答复的必要。

你們的来信还断定說，我們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談中对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抱怨”，正是由下述事实产生的，这就是“近来日本共产党領導人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开始公然背离了体現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協議

的方針”，并且攻击我們党，說我們党的代表团想抹杀这个所謂“基本事实”。

但是，正是你們，为了把根据原則，真誠而且具体地解决我們提出的旨在改善日本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关系的各項問題这件事加以“抹杀”，所以才企图一下子把会談扩大成为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进行論战的政策上和理論上的一般問題的討論。而且，你們對我們党进行无理的指責，說我們党已經陷于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路綫，譬如，过低估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否定和平共处，等等。在这个时候，你們特別卖劲的是，以我們党的刊物轉載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为根据，作出“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路綫有联系”的結論，并且攻击我們党，說我們党追随中国共产党，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內的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敌。

正象你們在这封来信中在几乎所有的問題上都把我們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而加以指責的那樣，当你們对同你們意見不一致的兄弟党进行指責和攻击的时候，几乎可以說，你們总是以那个兄弟党盲目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路綫为借口的。你們始終一貫采用的这种說法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日本的反动势力和商业性报纸，都毫不例外地說日本共产党內有什么“中共派”和“苏联派”啦，有什么“苏联路綫和中共路綫的对立”啦，并且頑固地进行反共宣传，把我們党說成似乎是按照外国党的指示行事的政党。你們要求所有的兄弟党都无条件地追随你們的路綫，一旦遭到拒絕，就断定这个兄弟党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的这种論調，既不符合事实，也沒有道理。这是要把全世界的兄弟党“划分”为苏联共产党的追随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归根到底，同誣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共宣传家們散布的論調，如出一轍。

我們党并不是一个无批判地追隨和盲目服从哪个外国党的党，而是一个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独立自主的立場决定对一切問題的态度的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論战問題，也是根据同样的立場加以处理的。但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場，决不是象調和主义、中立主义和折衷主义那样的曖昧的立場。我們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真理，对于破坏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真理的人，一定要加以批判，明辨是非，这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應該采取的态度。只要是同样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忠实于真理的党，那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則性問題的观点当然就会一致。本来，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應該是一致的。不言而喻，这和完全贊成某个特定的党或者完全反对某个特定的党的錯誤的盲从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你們把一直坚持这种立場的我們党，看作追隨中国共产党的党，乃是对我們党的莫大侮辱，同时也表明，你們从背弃原則的立場出发，已經不能客观地分析事态了。

你們的发言，在这一点上包含极其严重的內容。但是，正如袴田同志在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說的，我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的有限的期間內，不可能詳尽地研究你們的全部发言，因此，現在不作全面的答复，仅就其中的几点加以闡明，并向你們的代表团表示：“我們將把你們的发言內容，詳尽地汇报給党的領導机构，以便在进一步充分研究了你們的論点以后，在两党代表团的下次会談中再来陈述我們党的意見。”而你們对于这一点也表示同意。

然而，你們在我們党代表团还没有回国以前，就背信弃义地胡說“日本共产党拒絕討論这些問題”，并且把你們在两党会談中的发言內容拼凑起来而写成的四月十八日的长篇信件，突然送給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如果你們真象在来信中所說的，是以“兄弟般的

合作和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继续交换意见，并且有“逐步地克服分歧”的诚意，那么，怎么能够在代表团还没有向我们党领导机构汇报以前，就硬把这封信件送来呢？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你们在送来这封信以后还不到两个半月，就迫不及待地单方面地发表了这封信。这就清楚地表明，这种做法是你们一开始就预谋的行动，这封信唯一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改善你们党和我们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而在于企图在日本共产党员和人民面前，公开指责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借以扰乱我们党的团结，离间领导机构和党员的关系，破坏日本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

你们指责我们党“开始公然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线。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在因为我们党没有无批判地追随你们而感到愤怒的情况下进行的诬蔑和攻击而已。对于一直采取不追随任何党的那种独立自主的立场、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并且同偏“左”和偏右的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的我们党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无理攻击。这表明，你们企图用我们党的路线已经开始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线这种毫无道理的借口，来使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种种“干涉内部事务”以及指责和攻击“合法化”。不仅如此，而且必然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你们究竟是怎样理解宣言和声明的路线的？

我们想从正确地捍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出发，就你们作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上改变了立场”的证据而提出的四个理论问题，对你们的批评进行必要的反驳。这四个理论问题是：一、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任务的问题；二、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问题；三、以和平共处为中心的和平、战争和革命问题；四、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问题。

### (三)

你們首先說：“毫無疑問，日本共產黨領導近來在有關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意義與作用、有關現時代的內容和主要矛盾問題上背棄了一九六〇年聲明中所表達的觀點。”不能不感到驚訝的是，你們在原則性問題上，竟然用“毫無疑問”這種非常肯定的方式提出了這樣的嚴重指責，但是，作為這種指責的論據提出來的却只是一些非常膚淺的、幾乎完全沒有必要加以反駁的論據。

你們提出的指責我們黨背離莫斯科聲明的第一個論據，是說我們黨在分析國際形勢的時候，輕視了“社會主義體系這個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日益具有決定性因素的作用”。你們的信件說：

“只要援引一下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一九六三年十月）的文件就夠了。在這些文件中把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和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說成是現時代的主要矛盾，而只是順便提到了社會主義體系的作用。難道這種評價同一九六〇年聲明中提出的對現時代的著名闡述，即強調世界的發展首先決定於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這兩個體系的鬥爭，不是背道而馳嗎？”

這種指責，不論在內容方面，或者在形式方面，都是非常粗暴的，因為你們不想把成為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燈的我們黨的綱領、大會報告和中央委員會的一系列決議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只抽出分析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後的特定時期的國際形勢的中央委員會決議的一部分，而且蓄意地加以曲解。

我們黨的綱領，就現時代的內容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作用，

作了符合宣言和声明的原則性規定的如下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經超越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殖民主义体系正在迅速崩潰，从根本上动摇着帝国主义統治。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在深刻的衰退和腐朽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为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斗争的力量，已經成为决定現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党的綱領的这个原則性观点，是包括你們提到的七中全会決議在內的我們党的一切決議和方針的前提，我們党的实践活动当然也是一貫站在发展这个基本观点的立場上的。

我們党的七中全会決議，在分析目前同世界人民对立的帝国主义陣营由于它的內部矛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而“从整个說来，正在削弱”的状态以后，就当前国际形势的概括性特点作了如下的規定：

“就象这样，以国际形势來說，帝国主义陣营正在削弱，民族解放斗争等各国人民斗争取得进展，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发展，从全局來說，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們党的綱領指出：‘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來說，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論断在今天仍然是一貫起作用的历史发展規律。尽管如此，但是以当前的局面來說，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在原則問題上意見分歧而产生的不团結現象加剧，这种不团結現象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給世界革命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斗



爭造成了复杂而困难的情况，对国际民主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最近国际形势的明显特点是，帝国主义陣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一面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趁火打劫，一面戴上‘和平’与‘自由’的假面具欺騙各国人民，更加狡猾地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

“美帝国主义一面侈談‘和平’与‘自由’，一面一貫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陣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企图利用‘核战争訛詐’，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和統治。……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不为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和平’伪装所欺騙，不为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訛詐所吓倒，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上的統一和团结，加强民族解放运动、保卫和平运动和其他一切民主运动的正确的統一和团结，同美帝国主义实际上推行着的統治、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这个決議从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陣营为一方同社会主义陣营、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和革命运动等等力量为另一方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出发，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別重視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为什么在你們的眼里会把这个決議看成是“只是順便提到了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的決議呢？

（1）你們所以指責这个七中全会決議，是不是因为这个決議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沒有指出象你們在信件中所強調的那樣一些事实，例如，“社会主义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增加、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已經超过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等等。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陣营在物质生产領域取得的进展和胜利，是創造有利于世界人民斗争的国际

条件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你们认为，在分析国际形势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面的时候，必须经常列入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数字，而凡是沒有指出这种数字的对形势的分析，都必须加以指责，說它从根本上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綫，那么，就必须說，这是一种眼光过于狭隘的看法。在这里反映出这样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把既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又是世界最主要的革命力量之一的社会主义陣营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简单地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陣营的物质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

实际上，你们的信件认为社会主义陣营对世界革命进程发生的革命影响的增大，主要取决于在物质生产方面战胜资本主义，并且作了这样的說明：

“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竞赛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将导致在物质生产领域内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决定性优势，从而将为防止世界战争的斗争創造新的有利条件，对世界革命进程将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

你们在两党会谈时，也特別强调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并且一再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主义的实际范例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就能够对世界革命更加积极地发挥影响；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在物质生产方面，正在給帝国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确保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增加的优势。但是，所謂“社会主义的范例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生产力或者物质生活水平的高度。所謂社会主义的“实例的力量”，首先是这样一些因素的集合体——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剝削阶级、依靠人民的力量建立沒有剝削的新社会的这种巨大的革命經驗；粉碎帝国主义和反

动派的干涉、侵略和反革命活动，一贯捍卫了革命事业的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一贯支持和援助世界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站在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前列的、作为世界和平堡垒的世界性作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人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成就；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越性；等等。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即使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远较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也能够为全世界人民作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而且，在今天，尽管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水平上，同美国和西欧各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对全世界劳动人民仍然产生革命影响，其根据就在于此。如果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陷于经济主义观点，把社会主义的“实例的力量”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所实现的物质生产力的问题，认为在经济水平不高的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吸引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是薄弱的，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的最大前提是在经济竞赛方面取得胜利，在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在实际上就是贬低、片面地看待、过低估计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所应有的意义和作用。

(2)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七中全会决议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团结的问题，强调了这种团结的重要性这件事情使你们感到不满意？但是，我们党所以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因为这种统一和团结是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体系，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最主要的国际条件。关于这一点，莫斯科声明说：

“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它們获得成就和成績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陣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要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我們党正因为要高度评价社会主义体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所以才重視社会主义体系的統一和团结，并且把对企图破坏这种統一的所有的势力和傾向进行斗争作为我們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实际上，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之后，美帝国主义对苏联采取了一定的“緩和”政策，但在另一方面，却在越南南方、老挝、刚果等地越来越扩大侵略行动；它在今年八月，庆祝签订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一周年时，同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互相保证要共同努力，爭取“和平”，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公然开始了轰炸。美帝国主义的这个行动，使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七中全会決議的正确性，七中全会決議就美帝国主义企图趁着社会主义陣营內却不团结的机会、对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各个击破”的战争政策的危险性发出警告，指出了为爭取社会主义陣营的統一和团结而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然而，你們的信件，对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虽然作了种种論述，但是，对目前由于帝国主义者们的分裂活动和与此相呼应的現代修正主义者们的分裂阴谋活动而变得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統一和团结的問題、对使社会主义在发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方面的最主要的国际条件这个問題，却只字未提。不仅如此，你們常常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一語当作苏联（或者是苏联以及和苏联唱一个調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义語来使用，你們如此狂妄，好象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只起次要的作用。必須指出，这个事实表明，正是你們，輕視統一和團結——社会主义体系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泉源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处于优势的重要条件，給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陣营不团结現象的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事实上陷于在行动上不能保证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發揮它的历史作用的境地。

(3)或者，是不是因为七中全会決議沒有同意你們把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看成是現时代唯一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所以你們才拚命地攻击七中全会決議？

你們在两党会談中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資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現时代的三种革命力量，但是不能忽視，社会主义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斗争是世界政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軸，“現时代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就在于此。而且，你們在信件中也反复強調同样的思想，并且說这就是“一九六〇年声明里就有关現时代的内容和主要矛盾問題所表达的观点”。

这是对莫斯科声明的完全主观的解释。第一、莫斯科声明並沒有直接提出关于現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公式。而且，从内容來說，你們的这种观点，把莫斯科声明关于現时代的内容的規定不正当地加以片面化和簡單化。莫斯科声明决沒有提出那样的片面的观点。

**“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莫斯科声明)**

**“我們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

的力量的斗争”。(莫斯科声明)

就象在我们党的纲领中载明的那样，我们作了如下的评价：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是“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所有这些力量一面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打击，一面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确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即最后帝国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显而易见，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所依据的纲领的这个基本观点，是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的。而你们把现时代的主要矛盾简单地只归结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的那种观点，才是不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各个论点的、并且轻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的错误观点。

总而言之，莫斯科声明从整个说来，决不容许把你们所宣传的那种片面的矛盾论变成正当的理论。而且，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也不容许你们那种片面的歪曲。

因此，你们把七中全会决议作为材料攻击我们党的路线背离了莫斯科声明，你们的这种指责无论是从哪一个论点来说，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即使在这一点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你们所提出的对我们党进行指责的第二个论据是，所谓我们党“展开了广泛的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运动”。

“日本共产党报刊并不限于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意义不作应有的评价。它还走上了对苏联共产主义建设成就保持缄

默的道路，把发表关于苏联的材料縮減到最低限度，而最近則展开了广泛的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运动。”

在你們的信件中，說什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內部生活和政策”“只作歪曲性的介紹”，什么“在《赤旗报》上看到的那种对苏联不友好态度”最后将会“自食其果”。这才真正是“展开了”指責。对于这种情况，我們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么。我們在长时期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政策，一貫力求尽可能正确地向日本人民进行报道和介紹，而且，就象已經談到的那样，尽管你們党近来几乎完全沒有向国内介紹我們党的基本文件和重要文章，但是，就象刚才用具体数字所表示的那样，我們一直大量介紹你們党的重要決議和文章。不言而喻，伟大的列宁所締造的苏联共产党的經驗、十月革命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同时进行的階級斗争的經驗，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在內，都是寶貴的經驗，如果根据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教訓。但是，这决不等于說，我們党不加以独立自主的分析批判，就按照教条主义方式汲取和盲从你們的一切經驗，这样做反而会违背列宁的教导。况且，原封不动地象鸚鵡学舌那样重复你們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則性观点的、而以大国主义观点进行的宣传，那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最近你們越来越严重地背离这些原則和观点、并且明目张胆地干涉我們党內部事务的这个时期，我們特別对于你們的文件，以更加独立自主的批判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只要不否认各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独立平等的权利，那就当然不能把我們党的这种自主的态度說成是“輕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运动”而加以指責。你們极力指責我們的这种作

法，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你们已经陷于那种要求所有的兄弟党无条件地服从的大国主义立场。

我们历来一贯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反对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两种机会主义，即“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我们除了对你们在最近违反莫斯科声明（莫斯科声明规定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义务是“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企图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进行批判以外，对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从来没有进行过“反对的运动”，当然也没有进行过“广泛的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运动”。拒绝你们为了强迫我们党接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原则的路线，对我们党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干涉，是对日本的革命运动负责的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任务，决不能把这当作“反苏运动”而加以攻击。为了在日苏两党之间恢复兄弟党的正常关系，加强和发展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的友好关系，进行必要而且适当的努力，使你们停止这种无理攻击，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正象我们党的一切活动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党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赢得的革命成果，从来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从来没有轻视苏联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和团结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我们对于我国的反动势力所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宣传，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最强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进行的反共主义的宣传和攻击，在战后一贯地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你们也很清楚，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时候，美日反动派以及右翼社会民



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利用“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試驗”的口号，一齐組織反苏宣传活动，企图把日本的和平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引向反苏的方向，但是，我們党同日本的許多和平活动家一起竭尽全力，同这个阴谋活动进行了斗争。然而，你們党的一部分人，最近同那些曾經叫嚷“抗議苏联核試驗”、站在反苏宣传前列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开始对我們党进行誹謗和攻击。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你們这封信件也成了这种“广泛的反对日本共产党的运动”的一部分。公开地踐踏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关于兄弟党的关系的准则，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对别的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責的，正是你們，而不是我們。

第三，你們提出批評，說我們不但低估了社会主义体系，而且相反地只重視民族解放斗争。你們的信件說什么“对宣言和声明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則性論点的歪曲，是同这样一种‘理論’有密切联系的，即世界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似乎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决定的”，“你們的某些代表不顾客观事实，无论如何要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的頑固企图，是令人奇怪的”。这种指責也只能是对我們党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方針的任意歪曲。

正象已經反复闡明的那樣，我們坚持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立場，决沒有把决定現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力量简单地只归結为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族解放力量，而是一貫地认为，这种力量基本上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力量、为爭取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从国际上来看，成为这一切解放力量的核心的，是国际工人阶

級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种观点，在前面引用过的党綱以及党的七届十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的決議》、《赤旗报》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发表的社論《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宮本总书记所作的題为《十四中全会決議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的基本意义》的講話、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綱領报告等等我們党的基本文件中已經反复闡明，完全沒有怀疑的余地。

迄今，我們对于那种稍稍低估世界主要革命力量之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革命作用的傾向，一直进行了斗争，而且，今后仍将继续进行斗争。不过，我們說要正确地评价社会主义陣营的作用的这件事情，决不等于說，我們对于社会主义陣营中的某个国家为了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而采取的輕視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或者硬要社会主义陣营与整个和平民主力量接受这种政策的傾向，可以不进行批判。对于社会主义陣营中的一部分国家出現的这种傾向放任不管，就等于在实践上降低社会主义陣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所謂“古巴危机”的时候，你們曾經企图甚至不同古巴政府在事前进行必要的磋商，就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国际視察”的要求，并且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妥协而牺牲古巴国家和古巴人民的主权，这种做法就是这种錯誤傾向的典型表現。我們当时支持了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五項要求，而沒有表示要无批判地追随你們的这种錯誤方針，因而引起了你們的不滿。但是，我們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陣营的革命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并且非常重視这种作用，所以才把不去无原則地追随这种在实践上降低社会主义陣营的作用的錯誤傾向，而且把不同这种錯誤傾向妥协，看成是我們的国际义务。

然而，我們必須同那种只看到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而低估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倾向进行斗争。

因为，第一，即使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仍然有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为了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下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而且，就象莫斯科声明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些尚未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来说，斗争的主要力量始终是以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领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的责任，已经落到那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肩上。

“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每一国家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输入，也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它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结果。”（莫斯科声明）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莫斯科声明）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促进民族解放斗争，创造有利的斗争条件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片面地强调这种作用，忽视各国人民自己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特别是在现时代，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根本问题，而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的经济竞赛中取胜、增加“社会主义的范例的吸引力”，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导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结果势必使革命运动陷于同工人阶级的革

命立場格格不入的被动的等待主义，而使革命的胜利遥遥无期。

因为，第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是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关系。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支援和鼓舞民族解放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反过来，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也起着削弱帝国主义，支持社会主义、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的作用。

遗憾的是，不能說你們的这封信正确地强调了这种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观点。你們虽然强调說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社会主义范例的吸引力”增大的作用、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和合作”等等，但是，却几乎完全没有談到社会主义的加强和发展同时也有賴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样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这种观点，就必然会产生下述偏向：看不到社会主义体系对民族解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决不是一种恩惠或者单纯的一方面的义务，看不到这种支持和援助对社会主义体系本身的加强和发展来说，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任务，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低估还没有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

从前面所說的我們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你們提不出事实就說我們党的“某些代表”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这种指責是完全不恰当的。

只能认为，你們这样违背事实蛮不讲理、无端寻衅的原因在于，你們自己低估現阶段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企图利用所謂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这样一个借口，来攻击那些重視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

的意义和作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成为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等世界各种矛盾互相交錯、产生最尖銳的危机的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革命、朝鮮革命、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等一連串的人民革命也贏得了胜利，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新的强大的堡垒。而且，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越来越旺，正以任何人都无法阻擋之势，席卷着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而且，众所周知，目前，美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統治在各种矛盾日益尖銳的情况下正在趋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崩溃的这个地区，看做帝国主义和人民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正在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遏制古巴政策”等反对社会主义的計劃，同时开始进行軍事冒险，譬如对南越和老撾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行带有全面战争威胁的血腥镇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公然进行侵略等等。

承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个地区正成为当前世界各种矛盾最尖銳的地区的这个事实，正确地评价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对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对世界革命的胜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决不是要把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融化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之中，也不是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不是把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碼事。这个地区正成为各种矛盾最尖銳的地区这个說法的意思，正和一九一七年俄国曾經成为世界帝国主义鎖鏈中最薄弱的环节的情况相同，而且象你們的这封信件所承认的那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国

家已經成为帝国主义鏈条的‘薄弱的、易于打碎的环节’”。

然而，你們对那些根据难以否认的事实承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个地区現在正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帝国主义力量最紧张地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这一事实的人们，时常加以指责，说什么这种理论是一种低估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作用，确认主要是农民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的反列宁主义理论，等等。这种指责只能暴露出，你們已經陷于那种无可救药的“欧洲中心主义”。这是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一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地区站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一支部队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它們因国家不同而有强有弱，但是都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只要不否认这个事实，那么，这种指责就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你們是說，莫斯科声明所說“站在現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論点意味着，只有苏联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等地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才是“反帝斗争的领导者”和“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者”嗎？就象近几十年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如果被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所领导，就不能成为本国革命的“领导者”，更不用說世界革命了。尽管是一个经济落后、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的国家，如果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中間确立了领导权，那就不仅能够在这个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中的一支最革命的部队，对整个世界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如果你們忘記了历史的这个經驗教訓，并且形式地抽象地认定只有

“工人階級基本群众集中的”經濟发达的国家才應該掌握世界革命的“領導权”，那就必須指出，这种想法是一种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想法。

最后，我們迫切地希望你們停止这样一些凭空捏造的指責和含沙射影的諷刺，說什么我們党的“某些领导人打算通过損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来提高自己的威信”，“日本共产党领导打算协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现“旨在使”民族解放斗争“屈从于领导权的欲望和野心”的“計劃”，正在“把自己的党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立起来”。同时，我們还迫切地希望你們不仅是用言語而且要用行动貫徹你們在这封信件中所說的正确观点：“只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对帝国主义的最終胜利。”如果你們不走这条道路，而进一步采取你們在这封信件中表明的那种态度和政策，那么到头来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結果：敗坏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和威信，降低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給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的反帝斗争造成更大的損害。

#### (四)

其次，我們想轉到第二個問題，即关于評價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問題。据你們的信說，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問題”，在我們党的“正式文件中、在它的报刊”上“发表了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同意的观点”，那些文件和文章的作者“不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战略的起碼的原理”，另一方面，却“竭力惡意

歪曲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据说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在你们的信中到处出现的这种近乎谩骂的肆意指责，无非是从一开始就使同志般的正常的争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希望你们作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谦虚一些的争论态度。

你们举出了一些论据，来指责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就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上，你们的代表团，对我们党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能够给予有根据的回答。遗憾的是，你们写在这次来信中的论据，也不过几乎完全是当时你们提出过的那些论据的翻版，这些论据不仅不能改变我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反而只能进一步使我们确信“不能支持”那项条约的态度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一再公开表明过我们党的态度，并且也告诉了你们，因此，在这里，我们决定只简单地叙述我们针对你们的论据提出的反驳。

在你们提出来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辩解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说法纠缠在一起。

第一种说法，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是走向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完全禁止核武器的理所当然的第一步，企图无条件地使那项条约正当化。另一种说法，却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即使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期不是正确解决核试验问题的办法，可是，由于最近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变了，它已经转化成为人们应当予以支持的东西；这种说法，企图以形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为理由，来使那项条约正当化。这两种说法，在性质和观点上都是完全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一点，即使只进行初步的逻辑分析，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你们的来信中，你们究竟采取哪一种观点，这虽然不一定是清楚的，但是，可以说，你们满不在乎地



把这种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說法一起端出来这件事本身，說明你們为了使自已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正当化”并且加以贊美，是不择手段的，是在拼凑信手拈来的論据。

讓我們从第一种說法开始，来研究一下你們的論据吧。你們在来信中提出这样一种不顾事实的論調：似乎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历来采取的一貫的立場。你們在这样說的时候提出来的最主要的論据是这样的一种說法：我們党的代表团认为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通过的文件互相矛盾这个意見是錯誤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但是，我們认为，完全违反事实的，毕竟还是你們的說法。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通过的《和平宣言》中的“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而其第一步是立即停止試驗这种武器”。这个呼吁，以及一九六〇年《告世界人民书》中的“要求立即禁止試驗、生产和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杀伤武器”这个呼吁，都决沒有象你們所牵强附会地解释的那样主张使地下試驗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試驗。你們的来信，說什么部分禁止核試驗是“完全禁止生产、試驗和使用核武器”这个“广泛的任务”的一部分，把問題說成好象在于协定范围的大小，认为部分禁止核試驗是“走向目标的第一步”，企图使部分禁止核試驗同《和平宣言》趋于一致。但是，事实同你們的說法却完全相反，使地下試驗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試驗，不是“完全禁止生产、試驗和使用核武器”这个任务的一部分，相反地，是同这个任务处于敌对地位的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这就是說，第一，一九五七年的《和平宣言》所提出的、关于立刻禁止核武器試驗的要求，正确地表述了全世界人民要求无条件

地禁止一切核試驗來作為**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的願望。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在日內瓦開始舉行的禁止核試驗會議上，美國政府之所以建議實行不包括地下試驗的部分禁止核試驗，建議採取作為全面禁止核試驗的前提條件的、間諜性的視察制度，完全出於一種欺騙性的策略，其目的在於使要求全面禁止核試驗的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和運動離開正軌，並加以削弱。第二，一九六〇年的《告世界人民書》，更加積極地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這種欺騙政策，要求沒有間諜性的視察制度的、無例外的、**無條件的立刻禁止核試驗**，這個事實是沒有爭論的餘地的。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兩次會議的任何文件的任何文句中，都絕對沒有使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合理化”的字眼。要找這樣的字眼，無論找多久，都是徒勞的。

你們援引一九六〇年的《告世界人民書》中說“各國人民對兩年內三個大國沒有進行核武器試驗感到高興”的地方，加以這樣新的解釋：“在告世界人民書中，對帝國主義國家政府在各國人民的壓力下不得不停止空中和水下試驗這一事實給予積極的評價。”（黑體是引用者用的）你們氣勢洶洶地說，停止在空中和水下的試驗加上“停止宇宙中的試驗”的部分禁止核試驗，為什麼會給各國人民帶來災難呢？但是，在當時自動停止試驗的期間，並沒有進行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全部試驗。雖然艾森豪威爾總統在U—2飛機事件發生以後不久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宣布重新進行地下試驗，大規模地開始了規模龐大的地下試驗準備工作，但是，實際上試驗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肯尼迪總統的執政下開始的。你們連這樣清清楚楚的事實也加以歪曲，顛倒黑白地說什麼《告世界人民書》好像容許地下試驗，而對**只是在空中和水下停止試驗**這種行動表示高興，這簡直是對通過《告世界人民書》的八十一國共產黨和

工人党代表會議的莫大侮辱。

反对部分禁止核試驗，要求立刻无条件地全面禁止核試驗的，不仅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和平运动也一致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爭取普遍裁軍与和平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也这样写道：

“我們要求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政府……就停止一切核武器試驗达成協議，并締結在大气中、宇宙中、地下、水下、到处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試驗的条約”。（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象下文要說到的那样，我們对于整个这次“爭取普遍裁軍与和平世界大会”是有意見的。虽然如此，不管怎样，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中，关于要求禁止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核試驗这个問題上，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簽訂以前，在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之間，因而在我們和你們之間，也都沒有过不一致的意見。

事实上，苏联政府在日內瓦禁止核試驗會議和十八国裁軍委員會會議上，都曾經一貫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关于禁止不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核試驗的建議，世界各国的和平、民主力量都一致支持苏联的这个态度。至少截至一九六二年为止的你們的言行，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譬如，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赫魯曉夫总理“給美国总统的信”、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四日赫魯曉夫同志在最高苏維埃會議上发表的演說、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給肯尼迪总统的“关于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备忘录”、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关于恢复核試驗的声明”、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赫魯曉夫同志关于九月三日美英联合声明的声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联政府关于重开禁止核武器試驗會議的声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苏联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試驗問題的声

明”、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苏联政府对十八国委员会会议上裁军谈判的备忘录”、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葛罗米柯同志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日内瓦裁军谈判的报告”、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发言等等文件，都毫无例外地说明，苏联政府是采取这样的立场的，即：地下试验正是“改进目前的核武器或者发展新型核武器的隐蔽的形式”，假如签订了一项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而使它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是无补于和平事业的”，是“欺骗各国人民”。这就是说，虽然有过或多或少的动摇，但是在这个期间，你们一直要求签订一项没有国际间谍制度的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假如不可能立刻签订这样的条约，就要签订一项规定在关于监督制度的协定实施以前自动停止地下试验、同时禁止在大气层内、水下、宇宙空间进行核试验的协定，即要求签订一项至少能够禁止一切种类的核试验的协定。我们可以继续援引许许多多的例子，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想引用两个。

赫鲁晓夫同志在上述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的声明中，关于把地下和大气层外的试验除外的美英声明是这样说的：

“他们向我们建议，让美国和英国（更不用说这个建议根本没有涉及到的法国了）保持在今后完善核武器的可能性。而且还不止如此。还要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更可靠地束缚住苏联的双手，不让它提高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想通过宣传，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他们想通过使苏联同意的办法使他们在核军备方面的备战活动成为神圣的，同时对他们的谈判对手——苏联暗下毒手。

“大家知道，实际上，美国目前制定的制造新型核武器的计划所依靠的正是地下试验，美英两国的建议就是要替这种试验开放

綠燈。

“多年來，美國在三個核強國日內瓦談判中力爭使**地下核試驗合法化**，這是締結完全停止核試驗條約的主要障礙之一。”（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其次，關於曾經是現存條約的原案的美英聯合建議的第二方案，蘇聯代表庫茲涅佐夫同志在上述日內瓦裁軍會議上所作的發言中，又說過這樣的話：

“美英聯合提出的第二次建議——不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草案**，其目的顯然是要犧牲**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利益**，單方面保持西方的軍事優勢。大家知道，美國一直長年累月在利用地下試驗來改進核武器。假如一方面禁止在**大氣層內外和水下進行核試驗**，另一方面却使**地下試驗合法化**，美國就可以束縛住蘇聯加強國防力量的雙手，而改進自己的核武器，增加它的爆炸力和效果。”（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就象上述那樣，你們所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從來就有的一致要求這種說法，簡直是毫無真實之處。

你們不老老實實地面對這些明擺着的历史事實，却千方百計地企圖證明，改變態度的不是蘇聯政府，作出让步、改變態度的是美帝國主義；並且在英斯科兩黨會談中發出這種驚人的綠論，說不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禁止核試驗條約本來就是蘇聯政府的主張。也就是說，蘇聯政府在一九五六年提出關於禁止核試驗的建議，因為當時核試驗只是在**大氣層和水下進行**，而沒有在其他環境中進行核試驗，所以這項建議的目的只是禁止在**大氣層內和水下進行試驗**，可是一九六三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加上了第三種環境——**宇宙空間**。這樣一來，你們就企圖把事情描繪成這樣，即，在一

九五六年，苏联政府就主张签订同一九六三年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相同的条約；而美国政府当时表示反对，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却不得不表示贊成，以加上宇宙空間而多少扩大了的形式，采納了苏联政府从前提出的建議。我們只有把这种說法叫作詭辯。除完全掩盖上述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历史事实以外，为了使通过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来取得地下試驗合法化这个做法“言之成理”，甚至不惜搬出地下試驗还没有成为大問題的时期的禁止核試驗建議，这种欺騙手法是不可能掩盖問題的实质的。无论你們怎样詭辯，都終究无法掩盖这个历史事实，即：你們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主张全面禁止核試驗轉变到一九六三年贊成使地下試驗合法化。

而且，你們的来信，說什么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走向”完全禁止核武器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符合人民群众的願望”的；还說什么条約的中心問題是“是否还要繼續用給人們造成威胁的放射性散落物毒化大气层”的問題，說莫斯科条約“結束这种威胁”，这样来美化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并且說什么我們党采取不支持这项条約的态度，是跟着“对危及数以百万計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險絲毫不感到不安、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特殊的自私目的就准备牺牲这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亦步亦趋”，这样来指責我們。但是，你們越是热中于企图证明部分禁止核試驗在本质上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你們就等于攻击苏联政府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象前面所詳尽叙述过的那样在五年間一貫采取的态度；等于控告全世界的整个和平、民主力量，說它們当时是站在你們所題“对危及数以百万計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險絲毫不感到不安”的不人道的立場上。你們越是强辯說，禁止核試驗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防止放射性污染，你們就越陷于自己打自

己嘴巴的处境,即,不得不承认苏联政府在自动停止試驗大約两年以后于一九六一年秋天首先重新进行試驗的行动,是一种不顾放射性散落物对人类带来的危险而只顾达到苏联“特殊的自私目的”的行动。

你们自己在来信中,承认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即:尽管“由于試驗,空气会充滿大量核裂变的产物”,但是,因为“要么我們制造强大的核武器并以此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軍事优势,要么帝国主义者保持自己的优势并将企图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給全世界”,“苏联不得已而进行試驗的时期”。当时你们对于帝国主义者一面狂热地准备核战争,一面却只是伪善地提出放射性污染的危险問題来譴責苏联进行核試驗这种作法,进行了适当的反击。例如,赫魯曉夫同志就說过这样的話:

“有一个很恰当的諺語說,‘头已砍掉,哭头发干什么。’帝国主义先生們一方面准备让人們在战火中死亡,同时却大談他們的健康。”(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演說)

总而言之,对于核試驗問題,必須从它会促使还是会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这个根本問題,而不能仅仅从放射性污染这个問題来加以考察。正因为如此,我們尽管比你们更加切身而清楚地了解日本人民要求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的願望,认为帝国主义的核試驗和社会主义的核試驗会給人們带来同样的放射性灾害,但是,我們重視这两种核試驗的不同的阶级意义,就在一九六一年秋天苏联重新进行核試驗的时候,我們也沒有仅仅考虑放射性灾害問題,而从爭取解决防止核战争这个更加根本的任务这样一种立場出发,沒有贊同对苏联的核試驗提出抗議。但是,你们却在本国需要进行核試驗的时候就說不應該只看到放射性灾害,而在部分

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後，却又開始說放射性災害才是中心問題。而且，你們還認為，對於你們以外的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美國帝國主義推行準備核戰爭的政策和核威脅政策這種實際的威脅，而要自己發展並且擁有用於防禦的核武器的努力，可以用一切惡毒的詞句加以謾罵。你們的上述說法，不過是根據徹頭徹尾自私自利的打算提出的歪理，意思是說：蘇聯擁有的核武器是為了和平的，而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擁有核武器就只能散播放射性災害和核戰爭的危險。你們的這種說法，歸根到底只能起這樣的一種作用，即：認為只有保持以美蘇為軸心的核壟斷體制，以及以此為前提的目前這種美蘇妥協，才是防止核戰爭的可靠的保證；阻止蘇聯以外的社會主義國家採取加強防禦力量的措施；助長美帝國主義永遠保有核武器的野心，使它容易進行核威脅。

我們不能不說，你們對放射性災害所採取的這種態度，是一種臨時應付式的、昨天那樣說、今天這樣說、名副其實毫無原則的、缺乏一貫性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僅會助長美帝國主義要永久保有核武器的野心和它的核威脅，而且會轉移全世界人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注意防止戰爭這個根本問題，使他們陷於混亂。這種態度，使為了不讓人類遭受帝國主義正在準備的核戰爭的浩劫而進行鬥爭的和平運動和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僅僅集中注意核試驗和放射性災害的問題；並且從防止放射性災害這個簡單的观点出發，把帝國主義的核試驗和社會主義的核試驗完全等量齊觀，倒退到“反對任何國家的核試驗”這種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以及基於第三種勢力論的“中立主義”观点；歸根到底將只能帶來有害的結果，即：削弱和平運動，有助於增加核戰爭的威脅。你們在改而採取贊成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立場以後，就開始明目張膽地同我國站在第三種勢力論的“中立主義”立場上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勾結在



一起，竟然甚至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你們过去一直反对的“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試驗”这个口号，这件事情清楚地证明了上述的情况。

圍繞核武器問題的斗争的中心任务，始終是防止核战争和消除核战争的危机；問題現在是作为尖锐地对立的两条道路的对抗和斗争摆在我們面前的，这两条道路是：要么就沿着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試驗的道路前进，朝着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和核战争危险这个方向前进，要么就被引进部分禁止核試驗这条欺骗性的道路，朝着以防止放射性污染为借口使核战争的危險增大这个方向后退。我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一条道路；你們从前也选择过前一条道路。

可是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除了法国帝国主义等一些国家之外，都一致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你們把一百多个国家表示贊成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这件事，看作证明全世界人民欢迎这项条約的重要证据，而加以重視，但是，这件事只不过再一次肯定地說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过去一直希望簽訂的正是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你們把我們党代表团关于这个問題所說的、在签字国当中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都是資本主义国家这句话，作为問題提了出来。可是，我們党的代表团是这样說的：“在提出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国家的数目問題的时候，当然不能不考虑在今天全世界的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基本上是資本主义国家或者附属国家，其中有許多国家在一系列的重要的国际問題上，都跟着美国或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亦步亦趋。”事实上，签字国之一的日本的池田政府也是依附美帝国主义，表示贊成美英的建議，一向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的。駐联合国代表岡崎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會議上，就說过如下的話，表示贊或不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我們不能不注意他提出

的論据同你們現在提出的論据几乎完全一致这样一个事实。他說：

“看一看裁軍委員會會議的進展情況，就可以說，除了地下試驗這一項之外，美英和蘇聯的觀點大体上已經趨于一致了。禁止在地上進行試驗，就可以使人類免于遭受放射性危險，有助于促進在其他方面禁止核試驗以及解決裁軍和其他重要問題。因此，我們应当立刻設法達成為了上述目的的協議；我們看不出有什么不能達成這種協議的理由。

“巴西在今年三月十六日舉行的裁軍委員會會議上，第一次建議要从這種觀點出發來實行部分禁止工作。我們對巴西的這個行動表示敬意。

“有人說，部分禁止試驗，會使地下試驗合法化。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部分禁止並不是最後的目標，而始終是走向全面禁止的一步。我們應當努力首先實行可能實現的部分禁止工作，以創造出良好的氣氛，然後循序漸進地達到最後的目標。”（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七日《朝日新聞》）

問題非常清楚。從前，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是一致反對部分禁止核試驗的，而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却以美國為首，一直主張部分禁止核試驗。你們完全抹殺這一事實，硬說你們過去就一直認為部分禁止核試驗是對的，這種做法雖然也許多少能起暫時迷惑那些不大了解情況的人的作用，可是根本無助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評價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且只能把問題搞亂，使你們的觀點陷於矛盾之中。這種等於偽造歷史的做法，我們希望你們今後再也不要採取了。

問題的實質只在於一點。這就是：至少截至一九六二年為止，在反對使地下試驗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這個態度上，你們和我們的意見曾經是一致的，可是，後來我們仍然認為採取同

样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你們的态度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变，沒有同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兄弟党进行任何必要的事先磋商，就表示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并且进而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的不团结現象更加严重。你們必須向全世界的民主力量說明这次轉变的理由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这是你們的不容逃避的义务。可是，截至目前为止，你們却根本否认自己对于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变这个事实本身，一直用这个办法竭力回避履行这个义务。就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談中，我們党的代表团也詳細地举出上文援引过的赫魯曉夫等同志从前說过的那些話，說明苏联政府目前采取的立場同从前采取的立場是根本互相矛盾的，但是，你們对于这一点却一句話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象上述那样，采取一味歪曲历史的办法，来力图掩盖苏联政府改变方針这个事实。而且，除使用这种詭辯的伎俩来“否认”自己改变方針外，又以繼續采取你們以前坚持过的立場的人沒有象你們那样简单地抛弃那种立場这一点为理由，肆意攻击那些人。非常清楚，即使把对部分禁止核試驗的評价問題撇开不談，上述的态度也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有的起碼的老实态度完全不相称的。

現在，我們想提出你們的第二种論据，即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关于核試驗問題的提法这个論据来加以研究。

既然你們的第一种說法，即认为不包括地下核試驗在內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历来提出的一貫要求，企图使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正当化”的說法，在历史事实的面前站不住脚了；既然你們从反对部分禁止核試驗的立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变，改而贊成部分禁止核試驗这件事情

已經很清楚了，顯然，現在就只有這第二種論據值得認真地加以研究了。你們在沒有坦率地承認蘇聯政府改變方針這個事實的情況下，提出了這第二種論據。我們認為，你們雖然是轉彎抹角地，却也總算事實上試圖說明自己改變方針的理由了；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但是，正象上文指出過的那樣，如果你們要前後一貫地堅持你們的現點，那就不能羅列這樣互相矛盾的兩種論據。我們在這裡希望你們再一次明確地就下述一點答复我們：你們究竟在這兩個立場，即一向就認為應當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這個立場，和認為由於最近情況有了變化因而應當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這個立場，在這兩個立場當中，你們站在哪一方呢？

你們的來信，正象上文也引用過的那樣，在談到蘇聯的核試驗問題的時候認為：在過去，儘管會產生放射性污染，可是，“要么我們製造強大的核武器并以此取得對帝國主義者的軍事優勢，要么帝國主義者繼續保持自己的優勢并将企圖把自己的秩序強加給全世界”，可是，“現在形勢起了根本變化”。你們這樣說：

“由於蘇聯人民的緊張努力，創造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帝國主義者失掉了實行‘實力地位’政策的物質基礎。在這種條件下，關於核武器試驗的問題也要從新的立場提出來。繼續這種試驗只能助長核軍備競賽。而禁止試驗并不會削弱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國防能力，因為蘇聯核威力的基礎完全不是靠地下試驗的幫助製造的各種核武器，而恰好是那些優勢在蘇聯方面的各種核武器。

“無庸置疑，莫斯科條約束縛着整個帝國主義世界的手腳，其中包括西德復仇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力求掌握核武器的手腳。”

但是，你們關於情況有了“根本的變化”這一點的解釋，決不能

使你們的下述說法“言之成理”，即：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已經从帝國主義者欺騙政策的工具变成了束縛着帝國主義的和平工具。相反地，我們不能不說：你們的這種解釋，暴露了你們在觀察世界形勢方面，在好些地方抱有根本錯誤的觀點。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在這裡即使提出什麼“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也是無法言之成理地說明事態的。這是因為，按照你們的論據，美帝國主義已經自己承認在核武器競賽中輸了，已經不想去努力發展具有更大威力的核武器，而親自建議要簽訂一項使那種對自己不利的力量對比固定下來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並且親自簽署了這項條約。這一點，是完全不符合美帝國主義的本性以及圍繞它的核備戰活動的一切實際情況的。

此外，如果那就是你們改變態度的真正的理由，那麼，你們就是犯了涉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的更重大錯誤。

第一，最嚴重的問題是，你們在這裡犯了核武器萬能論的錯誤，即認為蘇聯擁有比美國威力更大的“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因此“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且，從上述的錯誤又引出下述那種使人糊塗的對目前情況的認識，即所謂“帝國主義者已經失掉了實行‘實力政策’的物質基礎”。這些說法，並不僅僅是對帝國主義當前的政策作了錯誤的判斷這種估計上的錯誤。這些說法，表明你們認為世界的形勢不是由於帝國主義勢力和全世界人民力量的對比，而是由於核武器的優劣而發生根本變化的；還表明你們認為目前的帝國主義者已經失掉了推行“實力政策”即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基礎，從物質基礎說來已經很自然地不得不採取和平共處政策了；並且表明你們認為事實上帝國主義的好戰、侵略、壓迫和反動的本性已經改變了。我們不能不說，這些觀點清楚地說明，你們已經非常嚴重地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当然，正象我們可以从杜勒斯的“大規模报复战略”改变为麦克納馬拉和泰勒的“灵活反应战略”，杜魯門的“遏制苏联”政策改变为肯尼迪和約翰遜的“遏制中国”政策这些情况中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之間的、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事力量对比，是会影响帝国主义实施“实力政策”的具体形式和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說由于苏联在核战争力量方面已經占了优势，“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就失掉了，或者說軍事力量的对比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生变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实力政策”，那末，归根到底都会陷于取消階級观点的、資产階級的“均势”論，以及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帝国主义“变质”論和帝国主义美化論的錯誤。这样的說法，当然是不能容許的、肯定地背离和违反莫斯科声明的說法。要知道，《莫斯科声明》曾經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就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就美帝国主义的“加剧冷战的方針”，取得了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肯定的意見，并且呼吁大家为了和平而进行斗争。你們的那些观点实际上篡改并且取消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印度支那方面的局势正在发展成为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撾的战争。正象那方面的局势进一步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人民那样，美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行动都表明：即使是在所謂苏联拥有“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的情况下，他們也越来越殘暴地推行实力政策，并且一面使它的战略适应各个时期軍事上、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一面越来越大規模地推行核备战和核威胁的政策。日本現在正处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半占領之下，在冲繩島变成核导弹基地以后，又被迫让可以装载氢弹的 F-105D 型飞机进驻日本本部，港口让核潛艇“停泊”，并且用核武器来装备自卫队。間

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日本，把日本作为它实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的据点；日本已经成了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基地。就在这样的日本，正在英勇地进行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政策的日本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危险的、过低估计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观点。假如我们也去说你们说的那些话，我们党就会在战斗着的日本人民中间陷于孤立，成为笑柄。如果美帝国主义听到共产党人说帝国主义已经失掉了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也一定会捧腹大笑。而且，假如你们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项新政策的基础，就是所谓帝国主义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武断的对形势的判断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政策，就只能在实际上用背离莫斯科声明的观点来美化美帝国主义，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实力政策，并且使世界和平遭到威胁。

第二，你们把目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问题简单化为核战争，而且仅仅把它简单化为使用大型核武器的战争。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变成了泰勒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不仅重视大规模地发展核导弹武器的工作，而且特别重视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正在飞快地加强并且扩大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这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吗？即使可以认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防御力量这些情况的美帝国主义，目前不得不考虑如果发动使用大型核武器的全面核战争，自己也有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危险；但是，假如说使用小型核武器或者常规核武器的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的危险也正在逐步消失的话，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对美国帝国主义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熟视无睹，使每天都在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民解除武装。

第三，你們極端低估了美帝國主義的地下核試驗問題。你們的來信，在另一個地方說帝國主義國家過去沒有同意禁止地下試驗的主要理由是它們仍然企圖“以對這些爆炸進行監督做幌子強使社會主義國家接受它們的間諜活動。”但是，美帝國主義所以堅持繼續進行需要大量資金的地下試驗，並且使它合法化，其目的決不僅僅是要實現對蘇聯的間諜性的監督。正如一九六四年初發表的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年報”以及今年四月二十日發表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西博格送交美國總統約翰遜的“關於地下核試驗的報告”所公開承認的那樣，美國不斷舉行的地下核試驗，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後，已經超過二十八次；自一九六一年九月重新進行試驗以來，全部已經超過一百次。在這項地下核試驗計劃中，特別是為了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進行有限戰爭時使用的戰術核武器的发展工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僅如此，而且這項計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改進和发展包括大型核武器在內的一切類型的核武器，實驗截擊用的導彈，發展和試驗中子炸彈，等等。總而言之，是要試驗為進行核備戰和核威脅所需的核武器。這些事情，你們是不會不知道的。你們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美國地下核試驗的規模和目標，却採取這樣的態度，即：蘇聯的核戰爭力量的核心是一億噸級的核武器等等，而不是“靠地下試驗的幫助製造的各種核武器”，所以，不管美國要通過地下試驗製造什麼樣的核武器，都不必擔心。你們的這種態度，實際上就是以美、蘇之間的“和平”代替世界的和平，認為只要在美、蘇之間不發生核戰爭，那麼，不管美國為了在其他地區使用而發展、製造和貯存什麼樣的小型核武器，不管它對蘇聯以外的國家推行什麼樣的核備戰和核威脅的政策，那都是同世界和平的大局沒有關係的。特別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指望通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達到的重要目標之



一，是使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核武器工作发生困难，并且一面用核包围网来包围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相互抑制”，一面按照各个击破的原则来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所以，我们对于在你们来信中看到的那种态度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性，不能不真正感到忧虑。

第四，你们硬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把“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包括在内，“束缚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但是，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你们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可能想逃避或者破坏这个条约的企图”，把这项条约描绘成一项把帝国主义者的双手束缚起来，以致帝国主义者总是想加以破坏的条约。但是，对于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点也没有积极逃避或者破坏自己建议并已签订了这项条约的必要。相反地，他们正在全面地利用这项条约第一条第一项中关于把禁止核试验范围局限于大气层内、包括宇宙空间的大气层外以及水下的规定，来合法地、明目张胆地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而且，在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上，这项条约仅仅禁止“刺激、鼓励”其他国家试验核武器以及“参加”试验工作（第一条第二项），所以，他们大可以推进西德帝国主义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的核武装化工作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核武装计划，而一点也不违反这项条约的规定。他们在有必要进行大气层内试验的时候，就可以行使第四条规定的合法权利，片面认为“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只需要在三个月以前预先发出通知，就可以退出条约。事实上美国政府领导集团已经公开表明过这样一项方针，即：假如社会主义的中国采取针对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性的措施，那么，美国就要以这件事为理由合法地退出这项条约。帝国主义者究竟为了什么而要逃避

這項條約，或者破壞這項條約呢？這項條約決沒有把整個帝國主義世界束縛起來。這項條約尤其沒有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加以任何一點的限制。相反地，美帝國主義正在企圖依靠這項條約，來取得對於蘇聯的“核優勢”，並且把蘇聯以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手脚束縛起來，不讓它們努力加強防禦力量。

正象上述那樣，你們企圖以所謂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一點作為理由來美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做法，只能使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到贊揚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這個做法的危險性，而決不能使你們後來改變態度並且進而贊成美、英方面的建議這個行為正當化。事情的真相只是這樣的，即：儘管帝國主義並沒有作出任何本質上的讓步，你們卻放棄了過去採取的正確態度，不惜對帝國主義者作出不該作的讓步，並且同它們進行不該進行的妥協。

我們在上文對你們那兩種論據所作的考察，清楚地表明：擁有社會主義國家一半以上人口的五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在這項條約上簽字；包括我們黨在內的、一系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不支持這項條約，這種做法是正確的。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把你們所拋棄的、正確的立場堅持到底，因而正在對世界和平作出重要的貢獻。

你們只是對這五個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之一的古巴政府說了這樣的話：

“我們懷着尊敬和諒解的心情對待古巴政府未能簽署條約的特殊情況，不過，古巴政府仍然歡迎在三個領域內停止核試驗，認為這是愛好和平力量的勝利。”（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古巴政府之所以雖然“歡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是沒有在這項條約上簽字的“特殊情況”，正如卡斯特羅同志在保衛革命

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紀念会上发表演說时所清楚地說过的那樣，是因为古巴目前正在对美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威胁进行斗争，“他們是我們的敌人，而我們也是他們的敌人”。但是，这只是古巴的“特殊情况”嗎？不是的。这种情况，是沒有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上签字的所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特殊情况”，而且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也是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威胁的一切民族和人民所共有的情况。你們假如怀着尊敬和諒解的心情，来对待使古巴政府沒有签字的“特殊情况”，那么，你們当然也应该怀着尊敬和諒解的心情，来对待以美帝国主义为敌，正在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都处于不該在这項条約上签字、不該支持这項条約的共同情况这个事实。此外，这种“特殊情况”，是一切想忠实地遵循莫斯科声明中“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这一規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共有的情况。为了使你們在来信中所說的“苏联共产党正在动員群众起来反对作为主要敌人和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这句话不致于变成临时应付的空話，你們就必须严肃地对待并且認識到这一点，即，你們的党本来也是不應該贊揚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你們领导的政府也不應該在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上签字的。假如你們不了解这一点，而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敌来进行斗争这种行动，是与自己无关的、只是古巴人民和政府才有的、例外的“特殊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們已經終于开始不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敌人来看待了；在对美帝国主义要采取什么态度这个原則問題上，你們“公然背离了体現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協議的方針”了。

但是，你們不仅不对自己背离莫斯科声明的路綫的行为进行

反省，相反，却对真正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斗争，并且从这种立场出发，坚持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采取批评态度的我们党，集中火力进行充满恶意的攻击，说什么我们抛弃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线。我们不能不说，这的确是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诬蔑。

另外，你们的信，甚至一面用骗人的手法，引用我们在评论员文章《最近的文学状态和党的任务》（三月五日《赤旗报》）一文中指出反党分子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塞进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进行分裂阴谋活动的地方，嘲笑我们党，一面指责我们党，说什么我们自己选择了脱离人民的道路。可是我们党在从池田内閣、自由民主党、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到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演出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大合唱的时候，却毅然决然地坚持采取了批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并且一直展开斗争，拒绝了各种企图使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的斗争离开唯一正确路线的做法。而你们却说什么：“顽固地攻击莫斯科条约，从而为右翼力量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斗争提供了方便的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在孤立自己的党。……日本共产党正是在这点上必然要遭受损失。”

而且，来信还说什么：如果日本共产党“不站在反对莫斯科条约的立场，而摆出事实的本来面貌”，就是说，如果指出“日本人民迫使池田政府签署了条约”，指出日本人民正在以这个条约为基础，为争取彻底禁止试验，为争取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为争取实现彻底裁军而进行斗争，那么，“日本国内的政局岂不会变得对进步力量更有利吗”。

但是，所谓同日本政府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事实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谈过，日本政府老早就开始违反日本人民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愿望，一直表示赞

成美国方面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草案。現在，我們还必須补充这个事实，即：实际上，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締結之后，向池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立即在条約上签字的，并不是日本人民，而正是美帝国主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上临时签署的同时，就要求池田首相正式参加。关于这一点，《每日新聞》当时駐华盛顿的特派記者报道过如下的事实真相：

“据国务院的看法，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参加条約将能大大加强推动世界輿論的力量；期望这不仅会有助于使条約变成‘全世界的’国际条約，还会对中共的核試驗造成某种压力。而且，国务院还认为，肯尼迪总统就这个条約，除了亲自写信給法国和西德这两个直接有关的国家以外，就只給日本写了信，这件事情也证明了上述情况；美国政府非常注意日本是原子弹受害国家，又宣布过不进行战争，并且热烈地希望全面禁止核試驗这种独有的处境。”（特派記者石塚华盛顿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电，刊登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每日新聞》上）

如上所述，“事实的本来面貌”表明，日本政府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上签字，不仅不是由于日本人民的压力，而且，这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政府作为欺騙日本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战略”的一个組成部分而策划的一个阴谋。你們向我們党提出“忠告”說，为了不“脱离”人民，就需要閉眼不看上述事实，把池田政府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上签字这个行徑美化成为日本人民施加压力的結果，并且要改而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这个“忠告”，就是劝我們党对美日反动派的欺騙政策实行合作，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含意。

我們党过去沒有而且将来也不会作美帝国主义的走卒而帮它这样去騙人。即使我們党由于不附和你們也参加的、对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贊揚所造成的“輿論”而似乎处于孤立地位（借你們

的話來說，就是暫時“遭受損失”），我們黨也決不害怕。你們黨的締造者列寧曾經經常嚴厲地譴責那些為了眼前利益和計較政治上的一時的得失而不太願意把事實和真理告訴人民的人，以及那些出賣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無論你們提出什麼樣的“忠告”，我們也要堅決地繼續遵循列寧的這一遺訓。而且，如果我們從大處、遠處着眼來瞻望革命運動的前途，那麼，無論在任何時候，徹底維護日本人民的真正利益，這才是把我們黨同黨的母親即群眾密切聯繫起來的基礎。事實上，同你們的預料相反，我們黨不僅沒有在人民中間陷於孤立，而且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之後，在七中全會上表明了批判這個條約的態度以後，在去年十一月舉行的大選中，我們黨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使支持我們黨的選票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四十。

象條約簽訂後不久召開的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所表明的那樣，亞洲和日本的現實生活使有覺悟的民主力量一開始就對美帝國主義指望通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來達到的、危險的目標保持警惕。的確，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後不久，也有過相當多的人受了同時展開的、贊揚條約的大規模宣傳活動的影響，被那種覺得這個條約似乎就是走向緊張局勢真正緩和與和平共處的轉折點的、玫瑰色的希望所迷惑。但是，在過了一年以後的今天，面對着日本人民每天進行的鬥爭的實際情況，甚至那些還認為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人，也難以全面而無條件地贊揚這個條約了。象你們的信所說的那類毫無根據的、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贊揚——說這個條約不僅使大氣的放射性污染的“威脅得以結束”，而且把包括西德復仇主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內的“整個帝國主義世界的手腳束縛起來了”——，對於這種贊揚，除了那些由於抱有特定政治目的而要閉眼不看實際

情况、硬要“贊揚”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少数人以外，在那些正在严肃地进行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統治的人們中間，現在几乎誰也不加以理睬了。另外，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进行的、同核战争危险密切联系着的侵略战争，正在彻底地粉碎一切說什么美帝国主义由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而已經改而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騙人鬼話。从这种现实生活看来，到底是你們还是我們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中間陷于孤立，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們还同你們不一样，我們并不认为，以贊揚这个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为前提就能够有效地实现禁止地下核試驗和禁止核武器。不錯，在口头上是可以这么說的，即：可以把規定禁止在三个領域进行核試驗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加以扩大，使它包括剩下来的地下核試驗，并且进而以此为立脚点，一直前进到禁止核武器的地步。但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严峻的斗争中，如果通过贊成帝国主义为了阻撓全面禁止核武器而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途徑，不依靠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依靠妥协和让步，并且进而硬要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依靠妥协和让步得来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削弱这些国家和运动的統一和团結，扩大不团結現象——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針，那是絕對不能够实现完全禁止核試驗和核武器的。那样的一种想法，只不过是你們的虛妄的幻想而已。在今天的形势下，能够实现完全禁止核武器和核試驗的唯一道路是：提出要阻止核战争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要求，在根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迫切願望来共同进行斗争这个基本方針的指导下，揭露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来达到的危险的目标，同那种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和贊揚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錯誤本

度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恢复这些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并且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的、强大的、国际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组织起来。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了。

我们衷心地再三希望你们认真地考虑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采取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全面地重新研究你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采取而且现在仍然采取的态度。这是你们无法回避的责任。要知道，你们不仅向帝国主义作了不能容许的让步，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这个条约，进一步加深了这两种运动中的不团结现象。

你们也很清楚，你们党的缔造者列宁，关于政党对自己所犯的錯誤应该采取的态度问题，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錯誤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我们再三希望你们遵循列宁的这一教导，公开承认你们在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硬要别人支持这个条约时所犯的錯誤，分析产生这些錯誤的原因和环境，审慎地讨论改正錯誤的方法。



## (五)

我們想就你們批評我們的第三个理論問題——以和平共處為中心的問題，談一談我們的觀點。

我們已經指出，在你們對和平共處的想法的深處，對於估計帝國主義的本性和政策，有着不容置疑的、嚴重的錯誤，如象你們說“帝國主義者失掉了實行‘實力地位’政策的物質基礎”。在這裡，你們也重複那種欺騙世界人民、美化帝國主義的理論，說什麼今天“帝國主義被迫同意各國的和平共處”，似乎莫斯科聲明所說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的目標已經實現了。這些話決不是單純的說錯話，或者偶然脫口而出的，而是證明你們實實在在地認為帝國主義力量，特別是它的頭目美帝國主義已經放棄了“實力政策”，“同意各國的和平共處”。

你們就是這樣，從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離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同時又無視世界的現實的觀點出發，對我們黨關於和平共處的態度，肆意進行攻擊，當然這種攻擊完全是不正確的、毫無根據的。

你們在來信中一開頭就斷言，我們黨“反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原因在於“日共領導人士放棄並背離了以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為目的而進行的鬥爭”，並且片面地指責說，“這一政策在《赤旗報》上、在日本共產黨某些領導人的言論中遭到了挖空心思的攻擊”。

遺憾的是，在兄弟黨之間進行這種完全違反事實的指責，對此不能不一一提出反駁。但是，既然對我們進行了公開的指責，我們就不能不首先從我們黨支持不同社會制度各國的和平共處這一極

其理所当然的事实出发，談一談我們的意見。

我們党一貫支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全体一致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所規定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一九六一年七月举行的我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日本共产党綱領明确地指出，在世界範圍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只要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力量不断地提高警惕，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有可能阻止世界战争，而且，作为“我們党当前的行动綱領的基本內容”的一項，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党要为爭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軍而斗争。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經濟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結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我們党保卫和平的活动，都是以两个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則性規定以及我党綱領的上述規定为指导而进行的。因此，你們指責說我們党反对“和平共处”，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你們究竟根据什么對我們党进行如此严厉的指責呢？

你們提出的第一个論据是說“在日共的正式文件中，也象在共党的刊物中一样，硬說苏联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是因为它‘放弃了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推动其他兄弟党也走这条道路”。

这个指責只能是一种誣蔑。因为不論是在我們党的刊物或者是在正式文件中，我們党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来没有对

它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过批评和攻击，而是一贯地给予积极的支持。当然，同时，我们党作为对日本人民负责的党——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半占领下的日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属下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反对复活从属于美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任何歪曲和平共处政策的行为，都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因而，同那种对和平共处进行修正主义的歪曲的行为进行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只要不否定莫斯科声明的上述观点，就不能够对我们为了维护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免遭修正主义的歪曲而进行的斗争，进行指责，或者以此为理由，诬蔑我们好象拒绝和平共处政策似的。相反，这种诬蔑，只能证明你们所说的什么美帝国主义失掉了侵略政策的物质基础，什么美帝国主义已经同定和平共处的那种和平共处政策本身，有着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

而且，与此相关联，必须简单地提一下，你们以下述理由指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据我们判断，是指七中全会决议）“歪曲国际局势的真相”：

“在日共文件中还企图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美国帝国主义者只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只准备对它们发动战争，并为此而利用同苏联的‘冷战’的某种缓和。”

从你们在这一段话后面所叙述的情况可以看出，你们根据七中全会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分析认定，我党似乎认为（1）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针对除了亚洲以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斗争、（2）苏联的“核力量”在反帝斗争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对我们提出了这个抗议。然而，这也是一种丧失了客观性的错误看法。

我們党的七中全会決議，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

“美帝國主義一面侈談‘和平’與‘自由’，一面一貫地準備對**社會主義陣營發動核戰爭**，並且企圖利用‘核戰爭說詐’，推行新殖民主義，加強它的侵略活動和統治。美帝國主義正在無止境地熱中於通過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央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和策劃建立東北亞軍事同盟等軍事集團政策，以及發展核武器和建立多邊核戰略計劃，在各國實行核武裝，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基地。

“特別是在最近，美帝國主義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不團結現象的機會，一面對蘇聯等國暫時採取一定程度的‘緩和’的態度，一面以‘遏制中國’政策為中心，結合那個用各個擊破的方式扼殺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陰謀活動和對中國、朝鮮和越南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在越南南方、中印邊界、朝鮮三十八度綫和古巴等地區加劇緊張局勢”。（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首先，這項決議指出美帝國主義一貫“準備對社會主義陣營發動核戰爭”，並且強調指出北大西洋公約集團和多邊核力量計劃的危險性。而且，還根據事實指出，美帝國主義作為攻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當前的策略**，“一面對蘇聯等國暫時採取一定程度的‘緩和’的態度”，一面在最近特別加強“遏制中國的政策”和侵略亞洲的政策。一切事實，都完全證實決議指出的這一點是正確的。

怎麼能夠說，這個決議“企圖把事情說成是”美帝國主義“只認為中國和其他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是自己的**主要敵人**”，“只準備對它們發動戰爭”呢？同時，怎麼能夠把指出美帝國主義當前一面回避同擁有核力量的蘇聯發生全面的核戰爭而遭到核報復的危險，一面把它當前的戰略重點放在進攻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上的這一事實，說成是輕視了蘇聯承擔“核軍備開支的重担”而建立的

“核力量”呢？

如果你們对美帝国主义当前把它的侵略的主要矛头不指向你們，而指向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实感到不滿，那末，你們向美国政府发泄这种不滿情緒，不是更恰当嗎？如果要把歪曲国际形势的真相当做一个問題的話，那么，我們倒认为，目前的主要危险在于，不了解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进攻构成了它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进攻的最重要的內容，因而，同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等侵略亚洲的計劃进行斗争的地区，是当前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战场之一，而只是根据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内部演变活动有联系的、在美苏之間出現的一定程度的“和緩”，就“企图把事情說成是”似乎美帝国主义已經开始采取和平共处政策。

你們为了证明苏联正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还列举了苏联政府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的几个事例。我們党从来没有忽视过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斗争的支持和鼓舞，而且为了发展日本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共同的反帝斗争中的团结，始終不渝地努力奋斗，这一点，你們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們不能忽视的是，尤其在去年七月締結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以后，你們对日本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今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在日本的最大的美軍基地之一横田周围举行的十三万人的集会为中心，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举行了自从反对日美“安全条約”斗争以来規模最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然而，《真理报》仅用几行字的消息报道了这件事，而且在消息中只說，“群众聚集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你們却非常重視在四天以后分裂主义者組

織的“和平大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等組織发出了表示团结的賀电。此外，众所周知，今年在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你們不但不支持高举阻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針锋相对的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而一心为了分裂和瓦解运动而进行了活动。你們的这种做法，不能說是“在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的斗争中給予他們援助”的态度。你們在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以后，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核战争政策和用核武器武装日本的政策，要求从日本全部撤除美军基地和全部撤退美国军队，爭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約”而进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富于战斗性的大联合斗争，不采取支持和援助的态度，反而采取了无視和輕視的态度，甚至采取了附和那些企图分裂和瓦解这一斗争的势力的行动。

总之，你們对我们党进行的所謂“歪曲国际局势的真相”的指責，是完全錯誤的，这同你們的其他的指責，是大同小异的。

你們在談到这个問題时还說：“苏联共产党认为，在动員群众起来反对作为主要敌人和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忽視其他国家——西德、日本、英国、法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是錯誤的。”

在这里，我們必須指出，你們經常把西德、日本、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危險同帝国主义的危險对立起来，从而企图轉移各国人民的視綫，使他們不去同你們自己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例如，你們在两党会談时說什么已經把做梦也想搞核試驗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脚捆绑起来，企图用这种說法使那个放任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計劃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

約“合理化”。然而，众所周知，西德和日本的核武装化，現在正作为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計劃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进行着；而且，西德和日本的軍国主义者也想承担这个計劃的一部分任务，以实现自己的野心。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对美帝国主义現在推行的、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和日本的計劃，絲毫沒有妨碍。这个情况非常具体地表明，那些低估或回避同“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陣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的人們，归根結蒂，也不能够对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特别是就日本的問題來說，你們在信中說，“誰不知道，恰恰是日本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东南亚的主要盟国呢？”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給予高度评价，但不能低估“反对目前正在国内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意义”。就这样，你們把日本說成是它作为已經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締結了同盟，并且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机械地并列起来。然而，这种估計，完全无視了下列事实：日本虽然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又是被美国半占領的事实上的附庸国，而美帝国主义依靠这种从属关系，把日本作为重要的据点，推行它的侵略亚洲的政策；同时，正在复活帝国主义的日本垄断資本势力，正在作为下級的同盟者参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的計劃，企图依靠这个办法来同时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莫斯科声明在談到在美帝国主义的統治下成为它的战争策源地的日本的形势时說：“美国帝国主义者也在远东也正在积极地复活战争策源地。他們侵犯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违背日本人民的意志，勾結日本反动統治集团，把新的軍事条約强加于日本。这一条約以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进行侵略为目的。”后来，日本垄断資本势力复活帝

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实行的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控制依然繼續存在，不仅如此，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莫斯科声明的估計，在今天仍然基本上完全正确。正在走复活帝国主义、軍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垄断資本势力的独有的侵略性，以从属的方式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相結合，正在發揮成倍地增加它的危險性和反动性的作用；对日本人民來說，則要求他們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日本垄断資本势力的斗争紧紧地結合在一起，加以发展。象你們那样，把日本看成基本上是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归根結蒂，就会低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低估它对日本的控制，而且对日本垄断資本势力的侵略性以从属的方式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相結合这个事实作出錯誤的估計，对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战争和侵略政策的实际情况作出錯誤的估計，使日本人民的斗争离开正确的方向。

你們提出的指責我們的第二个論据是，“近来，在日本共产党的刊物上还散布这样一种論点：硬說苏联在反帝斗争中依靠外交談判多于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赤旗报》甚至认为这个看法是‘論战的最重要之点’”。

不錯，我們认为，不仅限于苏联，無論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帝斗争中，如果不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主要想依靠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外交談判，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絕不是象你們所說的那样，意味着我們完全陷于“把人民群众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活动对立起来”的想法，而忽視了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定的情况，必須参預和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复杂的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保持坚定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倫



換和歪曲論点的手法。我們只是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也要忠实地坚持下述莫斯科声明的原則性观点，同时要在战略上更加坚定地、在策路上更加灵活地、更加强有力地展开外交活动，而不是要采取单纯幼稚的宗派观点、象幼稚病那样的观点，例如，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談判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机械地对立起来，而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談判；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必要积极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策路上要有灵活性，以便在必要时实行一定的妥协。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撥者的阴谋詭計，喚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針的人的神圣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組織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加强同一切不愿意有新战争的国家合作。”

我們所強調的，就是正确地执行这种坚持原則的外交政策。而且，我們还強調，把社会主义陣营在反帝斗争中的任务只归结为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談判，甚至用外交談判来代替人民的反帝斗争，是錯誤的。争取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决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始終是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我們強調这几点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万分应该做的事情。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告世界人民书》，也強調說明，保卫和平的事业有賴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贊成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政策的中立国家，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等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坚决进行共同斗争。《告世界人民书》強調說：

“所有这些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的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罪恶的战争計劃，保卫住和平，并且巩固各国人民之間的友誼。

“和平是不会自行到来的。只有通过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斗争，才能维护和巩固和平。”

我們所依据的，只有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性观点，再沒有别的。

此外，还必须談一談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有关、在实际上給斗争带来了損失的另一种錯誤倾向。这就是企图使人民群众的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倾向。前面举出的强迫別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事例。可是，我們还要再举一两个例子。

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举行的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当苏联代表团主张“首先恢复核試驗的国家就是和平的敌人”的时候，我們的代表曾經追問苏联代表团长叶·米·茹科夫：“可以这样主张嗎？”因为，显而易见，随着局势的变化，苏联有可能被迫首先恢复核試驗，而且，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不应当把苏联叫作“和平的敌人”。但是，茹科夫同志說，苏联不会首先恢复核試驗。結果，在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決議中，写进了如下尽人皆知的一句話：“在今天，第一个恢复試驗的政府应被譴責为和平和人类的敌人”。然而，如所周知，从那以后还不到一个月，苏联政府就恢复了核試驗。

美日反动势力、资产阶级报纸、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反党修正主义者等等，得意忘形地拿出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決議，群起对苏联恢复核試驗进行了譴責。但是，如前所述，我們党和日本有觉悟的民主力量一起，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仍然坚决而积极地說，苏联恢复核試驗，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而迫不得已地采取的行动。就在今天，我們仍然确信，我党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我們希望你們認真考慮的問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不同于策略的灵活性的意义上，缺乏正确的一貫性，从一个方面突然轉变到另一个方面，而且企图使世界人民的斗争服从这种轉变，这将会給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运动带来多么大的困难。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所謂“古巴危机”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古巴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會議上，全体一致通过了表示支持苏联政府最初所謂要“用苏联从古巴撤出核火箭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除軍事基地”的声明的決議。然而，这次會議刚刚結束，苏联政府又简单地收回以前的声明，发表新的声明說：“苏联单方面从古巴撤出核火箭”。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會議的決議完全成为空中樓閣。而出席这次會議的苏联代表却又立即开始活动，努力促使其他代表通过符合苏联政府新声明的另一个決議。很明显，这种做法，不仅損害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威信，同时給和平运动的团结也造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你們来信所說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人民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統治阶级施加的外交压力、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相輔相成”，只不过是画餅充饥的廢話而已。

看来，你們並沒有从过去的这种痛苦經驗接受任何教訓。在日苏两党会談时，我們党的代表团曾經指出这些事实并要求你們反省，但是你們对此装作不知，蒙混过去。不仅如此，例如，你們因为我們党沒有支持苏联所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而攻击我們党，說我們党“反苏”；而且更进一步，說《赤旗报》沒有立即大大地宣传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联所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簽訂“放弃用武力解决領土爭端和边界問題的国际协定”的建議，指責說：“这种事情，难道还能寬恕嗎？”但是，你們却在同一次会談中，宣布了这样的“原則”，苏联共产党要征求兄弟党的同意的只是“内外政策

的总原則及总路綫”，如象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其他問題，关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沒有必要一一和兄弟党进行磋商，征求同意。然而，正如已經讲过的那样，你們的外交政策从反对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轉变为贊成簽訂这个条約，正是同“对外政策的总原則”有关的重大轉变，正如从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内容看来也很清楚的那样，这是对兄弟党的活动具有深切的关系和影响的根本問題。归根到底，这就等于說，按照你們以苏联外交自由为借口的这一邏輯，苏联共产党甚至在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大轉变問題上，也沒有必要和兄弟党进行磋商，而兄弟党方面却有义务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这正是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做法。

和平共处决不是主要依靠同帝国主义者进行談判所能爭取到的，而在根本上是要依靠“世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莫斯科声明）的共同斗争，挫敗和粉碎那些拒絕和平共处，妄图实现称霸世界计划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才能爭取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它必須从属于这个共同斗争，完成它的重要的任务。說什么現在正同帝国主义进行談判，为使談判易于进行，硬要民族解放斗争放松攻势，或者要求別人不要进行揭露美帝国主义，或者說什么外交方針已經改变，因而和平运动的方針也要同外交方針配合，这种做法将会使局面变得一团糟。这无非是完全放任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只想实现美苏“合作”的方針。就这样，使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从属于、或者归并于以“美苏合作”为目的的外交談判，这同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所說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

之处。实际上，这非但无助于争取和平共处的事业，反而会使这个事业遭受损害，非但不能打击那个不愿意和平共处的战争势力，反而会为它们帮忙。

你们说在和平共处政策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你们为这种说法最后提出的论据，就是我们党的听涛同志以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的身分，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发表的演说。

你们在信里，对听涛同志的发言作了如下的引用，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听涛同志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路线‘实际上是企图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多方面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听涛同志由此作出了如下的结论：‘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路线，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来说是不适合的，是同这一斗争的目标相抵触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赤旗报》）。”

你们根据听涛同志的这个发言，以夸张的言词指责我们党，说：（1）“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不再使日本的同志们感到满意”；（2）“日本共产党的同志们显然想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名誉，这就是把这一政策同包括争取社会进步，也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内的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斗争的一切其他形式对立起来”；（3）“听涛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的讲话”，“意味着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热核战争”；等等。你们的结语说：

“同志们，你们看到，你们党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的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天渊之

別。”(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但是在开始談論內容的問題以前,首先必須說清楚的是,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會議的,不是我們党的代表团,而是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而且,听濤同志是以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团员的身分,在“关于裁軍和反对核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第一小组会上,指出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和平共处”及“普遍裁軍”的路綫的缺点的,而不是表明我們党关于和平运动各种問題的概括性观点。你們在这里,不仅把日本和平委员会的代表誤认为是我們党的代表团,而且认为听濤同志的发言表明了我們党关于和平共处与和平运动的概括性观点,这就犯了双重錯誤。如果你們想要反駁日本代表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會議上发表的观点,那就不仅要提出听濤同志的发言,还要提出“日本和平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議”与“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決議草案及提案理由的說明”,而且,如果你們想要反駁我們党对和平共处与和平运动的观点,那末,当然首先應該提出我們党关于这个問題的正式文件和我們党的正式代表团的发言。

而且,听濤同志发言的內容,决不是象你們所說的那樣,否定了和平共处与普遍裁軍本身。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的《赤旗报》,是这样报道听濤同志的发言的:

“听濤同志首先指出,自从几年前在莫斯科召开爭取和平与裁軍世界大会以来,世界和平理事会一直采取的那种路綫,把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的和平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結为‘和平共处’与‘裁軍’,实际上是要取代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独立、民主、社会进步的多种多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并且指出‘这种路綫会带来这样的显而易见的危险,使人民认不清和平的敌人,特别是和平的头

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解除人民的武装’。”

听涛同志接着批評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个錯誤路綫已經到了造成这样严重錯誤的地步：把已故的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肯尼迪总统說成是“和平使者”、“好心腸的帝国主义者”，并且在大会开始时，就建議为他默哀。他还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种路綫决不能保障世界和平运动的团结。很明显，听涛同志所說的这些话，并不是全盘否定和平共处的，而是从粉碎帝国主义者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出发的。

在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向华沙会议提出“決議草案”时一起提出的“提案理由的說明”中，更加詳尽地申述了这个观点。

“我們同意裁軍与和平共处，并且同意实现普遍裁軍和建立和平共处是和平运动的重大任务。

“但是，普遍裁軍与和平共处不能单靠高談闊論来实现。只有把爭取和平的各种斗争組織起来，联合成一股潮流，坚决有效地进行每一場具体的斗争，才能开辟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我們相信，世界和平运动現在必須集中自己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每一項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动员人民群众投入粉碎这种政策的斗争。因此，我們认为，把和平运动的路綫局限于裁軍与和平共处，会堵塞有效斗争的道路。”

从这里也会看得很清楚，听涛同志作为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員，表示反对那种把爭取和平的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結为所謂“和平共处”与“裁軍”的傾向和回避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傾向。其实，如果不动員群众認真地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不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把它們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一一加以粉碎，就不能开辟实现和平共处与裁軍的道路。把所有的和平斗争片面地归結为一般說来只是爭取

“和平共处”与“全面彻底裁军”的运动，就等于把和平运动变成为不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软弱无力的运动。而且，不言而喻，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和平运动也不能轻视事实上正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压迫进行斗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其他反帝斗争的意义，而需要发展和平运动和这些斗争的群众的团结。很明显，如果把所有的和平斗争变成为争取和平共处与裁军的斗争，机械地把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或者陷于以“和平共处”为名、美化帝国主义的立场，那就不能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

然而，你们对于听涛同志批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错误路线的发言，极力加以指责，另一方面又在同一封信中，引用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还说“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已成为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末，你们怎么能够对于批评那种模糊“和平的敌人”的倾向和把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压迫和反动的政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和平共处”及“裁军”运动的倾向的发言加以指责，甚至说这是主张世界热核战争呢？在这里，你们已经陷于不能自拔的矛盾，是非常清楚的。

如上所述，我们研究了你们作为指责我们党的根据而提出的主要论点，研究的结果证明，你们的指责本身完全是不恰当的。

但是，你们提出这种完全不能成为根据的根据，来对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进行着斗争的我们党加以指责，说什么“放弃了争取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什么“同这种斗争背道而驰”，最后甚至诬蔑说什么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中似乎有人“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热核战争”。



归根到底，你們就是这样进行誣蔑，竟然把在日本——它已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推行核战争政策的最大的策源地——站在日本人民的前列，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战斗的兄弟党，說成是热核战争的挑衅者。

这件事情表明，你們最后已經落到把造謠誣蔑作为主要武器的地步，造成了令人感到遺憾的局面，就連听慣了你們的粗暴言語的我們，对于这种誣蔑，也禁不住要感到憤怒。直到今天，你們一听到对你們关于和平共处的看法提出的批評意見或不同意見，便馬上給批評者扣上“希望热核战争”的帽子，进行攻击。难道你們是想要使全世界人民相信，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下述問題上，即要通过热核战争来輸出革命、还是要通过和平共处来促进革命的这种或那种問題上认真地繼續进行着爭論，而且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还有真心想打热核战争的党和领导人？这些都是絕對不容忽視的挑衅性的言論。而且，尽管曾經多次指出，这种把爭論的对立点变为一定的格式的做法是完全违反事实的，然而，你們明明知道这一点，这次又在敌人和人民的面前，对我們党和我們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同样的指責。我們党自从一九二二年成立以来，在专制主义天皇制度的野蛮鎮压下，一貫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斗争，許多领导人和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尽管如此，我們党仍然始終高举反战和平的旗帜。而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我們党以来，我們党的战斗队伍就继承了党的革命传统，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站在日本人民爭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的前列，为了防止核战争和禁止核武器而繼續进行了斗争。对于这样的我們党和我們党的战斗队伍，加以指責，說是什么热核战争提倡者，这种說法就連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反动势力也沒有想出来。这只能說

明，你們在同志的討論中為了駁倒對方，已經陷於極端的主觀主義的泥坑，並且語無倫次地進行了最惡毒的咒罵和亂扣帽子，這同共產黨人對待討論的風格相去太遠了。我們把這種情況同蘇聯共產黨過去的光榮傳統對照起來，就更加感到遺憾。

既然你們對認真地為和平共處政策而鬥爭的兄弟黨，進行上述那樣超出常軌的攻擊，那麼，我們不得不產生這樣的疑問：你們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可能與我們黨有着不同的基礎，也就是說，與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根本不同的基礎。實際上，在你們的信中的各個部分，充滿了曖昧的論點和錯誤的規定，這一切都證實提出上述疑問的正確性。

(1) 例如，正如前面指出那樣，在你們的信里，對現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情況的特點的分析，作出如下令人驚異的論述：

“而在我們階級敵人的營壘中也日益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條真理：如果帝國主義狂人發動世界戰爭，那麼資本主義就將被消滅和埋葬。這就是為什麼**帝國主義被迫同意各國和平共處的原因。**”  
(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正如前述，你們的信件在談到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部分里提出了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不符合實際的論調，說什麼“帝國主義者失掉了實行‘實力地位’政策的物質基礎”。你們在這裡又為了配合這種論調，進而斷言，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特別是在蘇聯持有“可怕的武器”的威力面前，現代帝國主義“日益清楚地認識到”世界大戰將會使自己滅亡，所以已經“同意各國和平共處”了。

但是，已經出現了使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遭受挫折和能夠防止世界戰爭的力量對比的變化，同帝國主義已經放棄侵略政策斷

接受和平共处，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依靠我們的斗争而产生的对时局的估計的問題，后者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对其政策的評價的問題。实际上，正因为力量对比对帝国主义不利，帝国主义才企图为改变这种力量对比而拼命地挣扎。实际上，正因为不能立即挑起全面的热核战争，所以才象当前局势所具体表明的那样：一方面，向苏联等国家做出一定程度的“缓和”姿态，另一方面，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热衷于挑起与核讹诈相结合的使用常规武器和小型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与“特种战争”。这正如我們党在七中全会的決議中已經明确指出的那样，使用了使社会主义体系分裂的各个击破的新战术。你們作出的帝国主义者“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这种估計，是仅从美苏关系的狭窄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是一种片面地夸大了目前美苏关系的“缓和”的近視的抱有幻想的估計，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就会一目了然。

在为了实现和平共处而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計劃，动员世界各国人民起来与之进行斗争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你們无视上述事实，作出“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估計，这种想法是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使人民放松警惕性的极其明显的一个大錯誤，同时也是极其危险的脱离实际的想法。

誠然，你們在口头上一般也还承认“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承认“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險”。但是，你們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是这样估計的：根据你們举出的例子，它似乎是一只“见了手持大棒的人不敢扑上来，充其量只是站在远处狂吠的”狗；把“发生战争的危險”，事实上仅仅看成是帝国主义陣营内部的一部分“狂人們”的例外的冒险而加以低估。非常明显，这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过低估計，是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

明的原則性的观点不能两立的。

归根結底，你們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把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現狀，硬說成是“和平共处”而加以承认，这不过表明你們不同帝国主义进行本质的、积极的斗争，并且还美化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企图以追随帝国主义并与它实行妥协的办法来极力維持你們那种娓娓动听的“和平共处”的現狀的政策。这种“和平共处”政策是錯誤的。很明显，它在国际形势的现实情况下和世界人民火热的斗争中必将迅速遭到破产。

最近，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事态的发展，极其具体地证实了你們认为美帝国主义已經接受“和平共处”的这种对現狀的認識是錯誤的，同时也证明了你們的“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八月三日，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紀念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一周年时对《真理报》《消息报》記者說：“我认为，締結莫斯科条約以来的一年，国际舞台上取得了新的經驗，这个經驗就是：如果积累某些信任，就能够朝着緩和國際紧张局势和在各方面达成協議繼續前进。……因此特別重要的是保障这个信任的积蓄，不使它减少，而是相反地，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它。”但是，正当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表白他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感”，并且強調互相信任是走向和平的道路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不是更加“推进”什么“和緩國際紧张局势”，而是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領海，对于这个共和国所属的島嶼进行非法的进攻，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規模的进攻。之后，八月五日，苏联政府与美、英政府发表一項联合声明，声明宣称：“我們表示真誠关怀各民族的真正利益，为达成符合这些利益的协定而做出积极的努力，我們能够尽力沿着通向相互諒解与和平的道路繼續前进。”正当他們相互吹嘘“和平”政策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向东京湾派出第七艦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大規模的轰炸。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領土与人民公然进行轰炸和侵略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中的一部分例外的“狂人們”干的，这次侵犯是按照美帝国主义头子約翰逊总统的指示进行的。在美帝国主义公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軍事侵略的这种危险的局面面前，你們不但不立即进行应有的反击，相反地，你們却帮助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使它的侵略罪行合法化，你們这种行为客观上起了帮凶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你們“相信”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并认为通过加强美苏之間的“信任感”就能够保持和平的所謂“和平共处”政策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事实雄辯地证明，你們的“和平共处”政策只是起到进一步纵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与侵略政策、有利于它猖獗活动的作用。

(2) 你們的信中关于同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方法的一节說：

“有人以用‘激烈的語言’对美帝国主义責罵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对它斗争的尖銳程度。但是，不管怎样咒罵，帝国主义者不痛不痒。对它起作用的只是现实的力量和坚定不移的态度。当帝国主义者有侵略行动时，苏联不限于示威，而是对遭受进攻者給予有效的援助，并迫使帝国主义者退却。”

在这一段話里，也明显地看出，你們把揭露、追究与譴責帝国主义者的“激烈的語言”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力量”以及“坚定不移的态度”对立起来，說什么前者对“帝国主义者不痛不痒”，为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只需要后者就可以了。这是你們在指責那些強調反帝斗争和不同意美化帝国主义的傾向的人們时再三使用的伎俩，这同样是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观点根本不能两立的錯誤論点。

莫斯科声明决不象你們这样把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活动視为对“帝国主义者不痛不痒”而加以輕視，而是再三強調“現

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别高的警惕”。正象前文所引用的那样，把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尖锐地追究战争挑衅者的阴谋和策动，唤起各国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的愤怒，不断地加强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等，作为保卫和平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予以最大的重视。不能不说，你们的信件，很清楚地说明你们脱离了莫斯科声明的上述的原则路线，过低估价从政治上动员世界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意义，片面地寄托在只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并以它为背景的外交谈判的活动上。

你们还进一步发展这种片面的看法，最近以来，你们实际上不仅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且进而三番五次地公开称赞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美化帝国主义者。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以你们指使下的一伙人为中心，竟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肯尼迪默哀，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上批评这件事，并且就硬要国际民主运动接受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观点这种行动提出警告的时候，你们在解释的时候说：（1）关于默哀的建议是法国天主教徒、作家马多尔提出的，根据“会议记录”，他毫无想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表示哀悼的意思，而只是向肯尼迪夫人的两个孩子表示了我们的同情与哀悼之意。（2）如果对非共产党人的这种建议提出抗议并且退出会场，那末，就会把自己同非共产党员隔离开来，并且给反动势力以加紧对共产党人进行中伤攻击的借口，因此，苏联的和平活动家也就采取同一步调。你们进而反过来指责我们随便歪曲事实。对这种指责，我们实在只能感到惊讶。这真是完全颠倒黑白的遁辞。

第一，无论从法国代表马多尔的题为《裁军与对核战争危险

作斗争》的报告是在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正式补充报告这一点说来，或是从苏联代表团的团员在举行全体会议之前曾经为了搞向肯尼迪默哀而对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事前工作这一点说来，还是从在全体会议上再三发表了赞扬“肯尼迪的和平政策”的演说这一点说来，你们那种把这项建议说成似乎是天主教徒马多尔个人主动提出的说法，显然只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

第二，至于你们说什么默哀是向肯尼迪夫人和两个孩子表示的这种辩解，那只能使人感到愕然。因为根据“会议记录”，马多尔在你们的引语的前面，以如下的词句，明确地提议为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肯尼迪总统逝世而默哀，并且最后“代表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向夫人和孩子“表示同情和哀悼之意”。

马多尔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以自己的死说明了他在本国遭到过多么大的反对。让我们大家对肯尼迪总统的善意表示敬意吧！为了表示我们对他的怀念，我想向全体美国人民表示我们同他们一样感到悲痛。在向肯尼迪夫人和两个孤儿表示同情和哀悼之意的時候，我认为我是在代表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

你们不仅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反而硬要国际民主运动接受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方针，可是当别人就这种做法质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说这不是对肯尼迪，而是对他的夫人和孩子表示同情，这显然是用十分明显的谎言和支吾搪塞的词句来为自己开脱。这种态度，简直不象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3) 另外，你们在来信中，把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表述为：“争取束缚帝国主义的好战势力，防止世界战争，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争取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为开展革命运动创造有利条件，全面援助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的路綫。

首先，你們把这条路綫称为“一九六〇年的声明的路綫”；其次，你們把批判这条路綫的人的立場，說成是什么“采取两个体系的軍事冲突的方針和靠武力确立社会主义”的路綫，以及什么“依靠战争推动革命的冒险主义方針”。这种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莫斯科声明对于和平共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問題，是这样說的：

“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樣，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責任，加强人民群众对巩固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信心，加强人民群众防止世界战争的决心。他們将竭力促进人民通过自己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积极斗争，**日益削弱和縮小帝国主义的障地**。”（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如果把莫斯科声明的这个提法同你們的提法对比起来看，显然可以看出：你們的提法，無論从它仅仅片面地強調和平共处有助于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而忽視了另一个方面，即“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这一点說来，还是从它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和平共处縮小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間的經濟竞赛这一点說来，都是不同于莫斯科声明的原則性观点的片面的提法。正如已經論述过的那樣，这种片面性，是关系到认为推进革命并且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归根結底是各国人民群众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



根本观点的重大錯誤。

我們必須再一次在这里指出：你們把不同意你們那種片面观点的人，都說成是什麼採取“要兩個制度實行軍事衝突的方針”啦，實行依靠各國之間的戰爭來推進革命的“冒險的路綫”啦，等等，來加以中傷，並且違反事實，把事態描繪成這樣，即：似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內部存在着要依靠武力來輸出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流派。你們的這種說法，絲毫無助於解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意見分歧，而只會使正在拚命地要把自己所計劃、準備、實行着的戰爭挑釁的責任轉嫁到社会主义各國和民族解放运动、革命运动方面來的帝國主义者感到高兴而已。你們的這種說法，是不能容許的挑釁性言論。

我們對於你們所表述的“和平共處”政策及其路綫的看法，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這封信中全部說完。我們只想對於你們所說的“從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明確而且無條件地支持過這個政策”這一點，提出明確的答复，這就是：我們黨過去一次也沒有、今後也不會支持或者追隨你們在這里所表述的那種“政策”，即明顯地同莫斯科聲明的路綫不相同的、包含片面观点和錯誤的“政策”。

如上所述，只是簡單地考察一下，也可以了解，你們的“和平共處”路綫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和平共處路綫之間，有好些極其重大的分歧。我們想等另外的機會，更深入地從理論上和政治上來說明這個問題。但是，僅僅從上面所作的論述看來，下述一點也是非常清楚的，即：你們僅僅以我們不同意你們的“和平共處”路綫這一點為理由，就把我們黨誹謗為和平共處政策的敵對者，並且給我們黨貼上“熱核戰爭”的煽動者這個標籤，你們的這種說法只不過是毫無根據的中傷，是為了硬要我們黨接受你們自己離開正軌的路綫的借口和指責。

## (六)

作为第四个理論問題，你們提出了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問題，即“共产党对待目前高举着和平与民主旗帜的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政策”問題，并对“日本共产党代表在各国际民主組織中所推行的路綫”，极尽指責之能事。这种指責，主要是从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角度提出的，可是，只要冷靜地研究一下国际民主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态，那末，誰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指責是牛头不对馬嘴的。这些指責，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反而暴露出你們在“国际民主組織中所推行的路綫”的錯誤而已。

讓我們分析一下第一个所謂分裂主义的指責。你們攻击我們党，說我們党与中国代表团合作，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組織”。

“大家知道，最近，日本同志千方百計地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旨在分裂有威信的國際民主組織——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組織的活动。”

你們在这里又使用了你們慣用的伎倆，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立場的党和代表团，仅仅以它們沒有追随你們为理由，反过来誹謗它們，說它們追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代表团。象这样侮辱性的指責，对于解決問題，是毫无益处的。如果你們真正象你們在来信中許多地方所強調的那樣，希望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團結現象并且改善两党間的关系，那么，我們就要忠告你們，希望你们完全停止对其他党进行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誹謗。

你們攻击我們党，說我們党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組織”。你們

首先举出的具体事实是：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日本代表团也曾經对大会決議投票贊成，但是大会一开完，“日本共产党的报刊却向大会的決議开火”。关于这一点，你們在来信中說：

“例如，《赤旗报》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刊登了从莫斯科回国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書記內野同志的一篇文章，譴責《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說这个文件‘沒有直接点和平敌人的名’，‘它对日本說来是不适用的’。

“众所周知，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不仅通过了《告世界各国人民书》，呼吁积极行动，反对侵略性帝国主义集团，而且还通过了其他一系列文件，指出争取和平的具体道路，指出战争危险的根源。这些文件譴責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包括在南越和南朝鮮的侵略行动，提出取消在别国領土上的軍事基地——主要是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軍事基地的要求，提出解散軍事联盟和撤走外国軍隊的要求，等等。大会还盟过建議，呼吁制止美国在东南亚的軍事行动，并立即从日本（包括从冲绳島）、泰国、老撾、南越、台湾、南朝鮮撤出美国軍事人員。

“怎么可以譴責通过了这样的決議的大会呢？要知道这些決議的确是旨在动員世界一切民主輿論、一切进步的和反帝的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軍事侵略、反对压制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这个指責的根据，是对历史事实的三番两次的篡改。

首先，你們提出了我們党的內野竹千代同志的文章《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归来》（《赤旗报》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并參看第二天即二十八日所載《补正》），认为这篇文章是“向大会的決議开火”。这篇文章論述了莫斯科大会的全部意义和性质，

論述了日本代表团的活動及其“報告和建議”的內容，論述了大會討論的內容，指出《告世界各國人民書》雖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不免具有一系列的弱點和局限性，並說明了日本和平運動在第八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以前的獨自的任務。關於大會決議和日本和平運動的關係，如果正確地引用原文，則文中作了如下的說明：

“對和平運動的先進部隊和有經驗的國家說來，這個大會的《告世界各國人民書》是一個必要的讓步和不得已的妥協，以便把和平運動的落後部隊和先進部隊統一起來，並把具有多年經驗的國家和剛剛開始的國家統一起來，而建立一條強大的和平戰綫。因而，對日本說來，如果停留在這個《告世界各國人民書》的階段上，那就是不適宜的。但儘管如此，我們也不應輕視這個《告世界各國人民書》和低估它的價值。因為通過它，日本的鬥爭就可以同世界的鬥爭聯繫起來。”（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如果通篇讀一下上面所引用的內野同志的文章，那就顯然可見，這篇文章一面認真考慮和平運動的國際團結，並從這種考慮出發而承認《告世界各國人民書》所具有的意義，一面又指出《告世界各國人民書》的局限性，並且指出，日本的和平運動必須根據日本的具体形勢，並站在前進的立場上，來完成日本獨自的任務和履行日本獨自的責任。怎麼能說這篇文章“向大會的決議開火”、“譴責”大會、並企圖“分裂”世界和平理事會呢？

而且，你們為了對我們黨進行攻擊，因而便捏造莫斯科大會的歷史，把這個大會描繪成一種完全與實際不同的情況，並主張說，莫斯科大會完全沒有內野同志所指出的那種局限性和弱點。

例如，你們把世界大會所通過的《告世界各國人民書》描繪成一種“呼喚積極行動，反對侵略性帝國主義集團”的呼喚書。可是，

尽管日本代表团曾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起坚持主张把关于“积极行动，反对侵略性帝国主义集团”的呼吁写进大会的决议里，但你们指挥下的人们却糾合在一起而极力加以反对，結果《告世界各国人民书》就有意識地回避了这一呼吁，只抽象地写道：“现在組織声势浩大的、反对**軍备竞赛和一切备战活动**的运动的时刻来到了。”（黑体是引用者用的）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嗎？

你们又说，大会还有“一系列文件，指出爭取和平的具体道路，指出战争危险的根源。”可是，莫斯科大会除了《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以外，并没有通过任何其他决议和文件，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你们究竟說的是哪一个文件呢？

的确，在世界大会的全部有关文件中，有的文件曾經重視你们所列举的各项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具体要求，并“指出”了“爭取和平的具体道路”。特别是第三分組会（裁軍和民族独立）上所提出的第二小組委员会的报告《外国軍事基地和軍事集团》，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首先譴責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包括在南越和南朝鮮的侵略行动”，并提出了你们所列举的一切具体要求和建議。假如你们认为用这些文件就可以掩飾大会的局限性，那就不能不說这又是你们的一个极大錯誤。因为日本代表团曾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代表团一起，强烈要求把这些文件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来通过，但你们指挥下的人们，又加以頑固的反对，結果，这个关于《外国軍事基地和軍事集团》的报告，不但沒有在大会上通过，而且甚至不能在全体大会上宣讀，而包括其一部分內容的第三分組会报告，也仅仅被当作一种报告来看持，而沒有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来通过，甚至連它的內容，也沒有被写进大会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里。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抹杀的事实。归根到底，你们現在为

了掩飾莫斯科大会的缺点，因而不得不引用这些文件，这只能說明，你們自己承认当时你們代表的态度是錯誤的，同时再一次证明了：我們党的內野同志的文章对于这次大会所給予的評价是正确的。

可是，你們对于你們的代表在世界大会时会反对通过这些文件一事，却装作一无所知。而在今天，你們更捏造历史，就好象大会曾通过这些文件一样。而且，你們还企图以这些文件为武器，来攻击当时正确指出大会局限性的人們。

象这样的作法，我們究竟應該把它叫作什么才好呢！

如上所述，有关莫斯科大会的一切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你們对于我們党的責难，說我們党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組織”等等，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毀謗，都是为毀謗而毀謗。我們必須指出，象这样的作法，是只会損害你們的名譽，而不能損坏其他任何人的。

关于“分裂国际民主組織”，你們又举出了一件事作为我們党的另一条具体罪状。这就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會議上，日本代表曾对同年六月的世界妇女大会作了一定的批判。

我們听到了这个責难，首先难于理解的是，你們为什么要在你們单方面发表的致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竟提出了这种有关国际民主組織与其成員——日本民主組織——之間的关系的“抱怨”。当然，你我两党，作为站在本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而进行斗争、并对领导这个运动負有一定責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国际民主运动以及共产党人在其中所采取的行动和政策，也应进行商談，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事情。可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对于日本民主組織的代表在国际民主組織执行机关中所作的发言，竟公开指名并違反事实

地加以責難，這不能說是參加國際民主運動的共產黨人所應採取的態度。

我們更加難於理解的是，你們把日本代表在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局會議上對世界婦女大會的進行情況等所作的一定的批判，直接看作是足以導致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分裂”的行為。到底你們是否認為，國際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已經沒有權利在國際民主組織的相應機關里，對自己所參加的集會和運動的弱點、缺陷和錯誤等，陳述自己的意見呢？或者，你們是否認為，具有上述權利的，只有以你們為首的一部分“被選拔出來的人們”，而其他的參加者，只要在你們的指揮之下，對一部分領導者們的所作所為只鼓掌表示贊成就可以了呢？

這封信是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回信，鑒於這封信的性質，我們認為，在這封信中，沒有必要過於具體地論述世界婦女大會等等。可是，在這次大會的進行情況中，曾經存在着許多反民主的缺陷，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讓我們只舉一個例子來看一下吧。在舉行世界婦女大會之前，曾召開過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局會議。這次會議由於考慮到大會的統一和團結，曾決定大會不得涉及中印邊境的問題。但在大會的第三日，印度代表却無視這一決定而談到中印邊境問題，並開始對中國進行攻擊。這時，主席團對於印度代表的這種違背規定的發言，一點也不想加以制止，卻反而一味利用它的權限，來剝奪遭受無端攻擊的中國代表的機會，使她們不能進行反駁。象這樣不民主地舉行會議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你們總想用“分裂國際民主組織”和“追隨中國”等威嚇詞句，來封住那些想對這種反民主的開會情況進行正當批判的人們的嘴。可是，如果日本民主組織的代表屈服於這種威嚇，而對這種反民主傾向置若罔聞，那恐怕就要意味

着对国际民主运动的統一和团结放弃了責任吧。我們对于国际民主运动內部的各种弱點，包括对这样一些反民主的开会情况，应该按照一定的方法来陈述意見并进行批判。这是所有站在独立和平等的立場上参加国际民主运动的各国民团体的正当权利和义务，这是不能由于任何威胁而被剝夺或加以放弃的。假如你們认为，由于日本的代表行使了这种当然的权利，你們就可以責难日本的代表，那就恰恰再一次证明：正是你們不理解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原則，只热中于把这个运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揮下，从而造成了目前国际民主运动不团结的最大根源之一。

其次，讓我們再看一看第二个責难，即把我們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路綫看作是宗派主义的責难。你們在来信中，把我們党的路綫說成是“把那些在对各种政治問題的理解上同党还不完全一致的人同爭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切断开来，要求他們无条件地同意党的綱領論点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黑体是引用者用的）的路綫，又說或是“摒弃那些同他們并肩反对战争威胁、向美国軍事基地举行示威、爭取銷毀核武器，但是不贊成共产主义意識形态的人，并把他們說成‘分裂主义者’”（黑体是引用者用的）的路綫。你們很简单地給我們判罪說：“这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早已遭到譴責的眼光短淺的宗派主义政策。”

可是，只要是对我們党的統一战綫政策多少有所了解的人，无論是誰，如果听到了这样的话，恐怕就一定不会产生一种疑問：“这究竟說的是哪个国家的党呢？”与民主力量进行联合和团结，这无論在我們国内的統一行动方面，或者在国际民主运动方面，都是我們党所坚持的統一战綫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原則，因此，我們党的綱領，对于这种联合和团结的必要性，作了如下的說明，



“以对于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有不同意見等等为理由，反对或者阻撓民主力量和广大人民要根据当前的迫切任务进行联合和团结，这是損害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的行为。”

你們在这次来信中所經常引用的我們党的七中全会決議，也曾一再強調說：“根据共同要求来开展統一行动”，这在和平运动以及其他民主运动方面，都是我們党今后必須加以坚持的統一行动的原則性态度。关于这一点，应该是完全沒有誤解的余地的。而且，事实表明，我們党的这种方針和态度，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对“安全条約”斗争、反对基地斗争、反对“日本南朝鮮会谈”的斗争，以及爭取恢复日中邦交的斗争等以爭取和平、独立和民主为目标的日本群众运动中，在把思想和信仰不同的广泛的人們团结到統一行动中这一方面，并在维护这种統一和团结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你們对于我們这个無論在国际上或在國內都坚持“根据共同要求来开展統一行动”这一統一原則的党，却大肆責难，說我們党把“共产党綱領性的規定”、“推翻資本主义和改变社会制度的口号”以及“共产主义的思想”等等强加給国际群众团体。你們把我們党丑化成最幼稚的“左”傾“幼稚病”患者。你們对我們党的統一战綫政策进行这样的誣蔑和誹謗究竟有何根据呢？从你們的来信看来，你們的唯一根据好象在于，我們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一貫高举斗争的旗帜，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反动和压迫的政策进行斗争。你們的来信說：

“日共出席莫斯科会谈的代表团团员就有关对待一般民主运动的态度問題而提出的論断的实质归結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日共才同意在各种国际民主組織中进行合作，即各組織的全体参加者都无条件地支持各国共产党綱領性文件的某些最重要的論

点，比如說，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世界宪兵的論点。

“共产党人对美帝国主义的角色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尽人皆知的。这样的评价也写入了各国兄弟党的两次会议的文件、我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綱領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綱領中去了。但是，共产党人一定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甚至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更不必說在广泛得无可比拟的居民阶层中，也有許多人还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綫，虽然他們在爭取解决维护和平的任务和其他一般民主目标的斗争中願意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难道日本同志不明白，有着其他的論壇来討論各国共产党活动的綱領問題，而国际群众組織是在另外一种一般民主基础之上組織起来的，这些群众組織的存在与活动的意义正在于爭取解决民主性任务的斗争嗎？”

第一，你們在这封信中照例又歪曲了我們在莫斯科会谈中陈述过的看法，并且把意見的对立歪曲成与实际情况不同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会议记录就很清楚，我們在这次会谈中所闡明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 日本共产党当然并非主张硬要国际民主运动一字不易地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詞句办事。当然需要充分考虑参加国际民主运动会議的非共产党人的想法。

(2) 但是，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必須按照同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針，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奋斗。这才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根本精神，才是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必須履行的重大义务。

(3) 現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見，即：要以“广泛的团结”为借口，反对共产党人在国际民

主运动中高举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但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谈共产党人的看法，不去做说服非共产党人的工作，并且还攻击那些高举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的人，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表示反对我们所持的这种看法。总而言之，对于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中采取的策略问题，你们同我们的意见分歧，但并非象你们所歪曲的那样，是什么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改变社会制度这个革命任务强加给国际民主运动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什么把按照字面承认莫斯科声明所作的、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和“国际宪兵”这些规定，作为民主力量采取统一行动的先决条件是否正确等等问题。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是共产党人在国际民主运动内部高举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具体斗争这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主旗帜、按照这个方针去说服非共产党人、并且为了把最广大的人民团结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中来进行斗争这个做法正确呢？还是以“维护广泛的团结”为理由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这些主张的做法正确呢？而且，我们主张高举这面旗帜，而你们却表示反对我们的这个主张。这一点，会议记录也有明白的记载；如果要老老实实地继续进行论战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回避或者模糊这个真正的分歧。

第二，你们在来信中，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理由，提出了惊人的论据。这个论据的内容是这样的：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口号，同改变社会制度等口号一样，是属于“共产党的纲领性规定”的口号；它是一个同争取实现一般民主目的的国际民主运动格格不入的口号。

难道你们以为，进行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

政策、民族压迫和反动政策的任务，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任务，而是在性质上与打倒资本主义和其他任务相同的共产党的纲领性任务吗？举个例子来说，保卫和平斗争的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是同旨在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不同的民主运动，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们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关于这一点，明确地把这两种斗争作了如下的区分，它这样写道：

“不消说，今天的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斗争，它是以极其广大的人民反对战争的要求作为基础的，但是这一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本身。”

把一般民主运动的任务同革命运动的任务混淆起来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你们正在企图以今天国际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即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压迫和反动政策进行斗争的任务，是革命运动的任务这一点作为理由，来取消国际民主运动的这个中心任务。

而且，你们似乎还认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或者你们党的纲领等文件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等等提法，主要是为了供共产党人只是在党内进行讨论或者在辩论的时候加以援引而写出来的，是不应该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向广大的非共产党人群众面前提出来的。

不过，听到这种论调，人们对于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理解“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声明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协议的方针”的这一点，就会产生很大的怀疑。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丝毫不容怀疑地说：必须把最广大的人民，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

革命，而且正是为了完成以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为内容的一般民主任务，尤其是保卫世界和平这项任务。莫斯科声明說：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莫斯科声明）

而且，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直接向世界人民发出的《和平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也明确指出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统治集团是和平的敌人，并且呼吁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

如果共产党人不为争取群众来支持这一方针，不为在国际民主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方针中实际上贯彻这一方针而奋斗，那么，究竟谁来为坚持和在实际贯彻这项方针而进行斗争呢？

有这样一种共产党人：他们虽然用文字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及同这种行径进行斗争的意义写入自己的党纲，但是放弃在世界和平运动和各種国际民主运动中以及在国内的各种民主运动中揭露美帝国主义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高举对这种政策进行斗争的旗帜的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拼命地阻挠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高举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并且最后到处宣扬什么美帝国主义改而奉行了“和平共处”政策，等等。显而易见，这些共产党人已经滚到同莫斯科声明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并且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协定的方针”。而且，国际民主运动最近发生不团结和混乱的另一个大原因就在于，这条要避免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并不是由中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是經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员的手塞进国际民

主运动中来的；他們这样做，是企图使許多国际民主組織改变它們迄今一直坚持的、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立場，并且向后倒退。这是清清楚楚的事实。你們对这些事态也負有重大責任，你們指責我們党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能认为，这是你們要掩盖这些事态的本质的手法。

实际上，尤其是在去年七月美、英、苏三国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以后，你們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所搞的活动，几乎完全脫离了常軌。你們策划阴谋活动，硬要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几乎所有的国际民主組織接受采取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等行动的、特定的政治立場，也就是我們在这封复信中指出的那种錯誤的政治立場，并且使这些組織的統一和团結变得越来  
越困难。

你們还硬要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也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而当这种企图在去年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遭到失敗以后，就开始走上了这样一条可耻的道路；同那些为破坏和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而瘋狂地进行活动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狼狽为奸，并且为这种搞分裂的阴谋活动出謀划策。不仅如此，而且，你們为了破坏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为了分裂無論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有重要意义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甚至不惜以国际規模大肆組織宗派活动。也就是說，你們不仅表示公开支持旨在反对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分裂性集会，而且积极地进行活动，去煽动和唆使日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国际上把这个分裂性集会伪装成“正統的”大会，并且在国际上糾集那些接受你們的意見

的人来促使这个分裂性集会“获得成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对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的国际性的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这一点是完全不容置辩的。

这种事态已经使广大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你们指责我们党的时候使用的那些话，譬如什么“企图分裂国际民主组织”啦，什么“奉行眼光短浅的宗派主义政策”啦，什么硬要别人接受特定的政治立场啦，等等，其实对你们自己才合适，你们才是应该对国际民主运动今天不团结和困难局面承担最大责任的人。

与此相反，我们党一直同日本的民主组织的许多活动家实行合作，在国际民主运动内部，遵循就各个方面迫切的民主任务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联合行动这个团结原则，为争取国际民主运动的真正团结而努力奋斗。就象我们党已经通知你们的那样，我们根据这种立场，在六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声明中，提出了一项争取恢复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开辟前进道路的积极建议。在这封信中，我们想再一次提出这项建议。我们深信，虽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问题上有分歧的意见，但是，这项建议，是能够为所有对国际民主运动的现状真正感到忧虑、希望这个运动团结和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人所接受的，是能够成为争取国际民主运动团结的强有力的基础的。

“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产生的不团结，给国际民主运动内部也造成了困难。如果在国际民主运动方面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不用多数表决的办法强迫别人接受某种立场和看法，而就意见不同的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各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明确规定的那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致看法，并且按照不同群众运动的领域的性质，在意见一致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那末，就能够开辟出前进的道路。我们党的党员和日本的进步的活

动家，在所有的国际民主組織的會議上，一直反复地提出了这个主张。而且，就象去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实际证明的那样，如果采用这种合乎情理的做法，那末，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一系列原則問題繼續爭論的情况下，国际民主运动的會議实际上也能够維持一定的团結，并取得进展。

“如果不想作这种努力，而始終企图强迫別人接受某种立場和看法，特别是接受显然违反莫斯科声明的、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方針，那末，国际民主运动也将会变得越来越軟弱无力，克服不团結的事情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这只能使美帝国主义以及战争、侵略和反动的势力感到高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會議，不應該是为了分裂，而應該是为了真正的团結》）

## （七）

以上，我們对你們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提出的問題，暫且先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内作了答复。

你們在来信中說，包括“在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条件下我們两党共同关心的其他一系列的問題”在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願意本着兄弟合作和国际主义团結的精神来討論这一切問題”。

我們党从一九五八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开始，經過第八次代表大会，直到今天为止，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已經就怎样估計美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爭取和平的斗争与爭取民族独立斗争、和平共处与普遍裁軍、革命的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結構改革等一系列問題，发表了肯定的看法，在国际上也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象《赤旗报》根据七中全会的决定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发展》中所明确地说明的那样，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对于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争论的各种问题要更全面更积极地加以阐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团结作出贡献。

“我们今后必须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从彻底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贯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的立场出发，更加积极地去完成自主地、更深入地、更全面地弄清楚国际上正在争论的各种问题的的工作。我们要这样更加积极地加紧努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更高度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团结作出贡献。”

作为这种积极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从加强两党之间的团结和捍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种观点出发，准备在今后继续采取必要的方法，同你们讨论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不团结的一系列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原则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表明过，而且，最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中又重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各兄弟党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争取到真正的团结。而且，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真正团结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要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侵略和反动势力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并且在国际范

围內使爭取和平、民主运动取得有成效的統一这个情况，为了尽量地防止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意見分歧而造成有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局面，在当前的各种条件下，有必要努力在爭取达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我們党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方面通过爭論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在束縛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的手脚方面，目前采取和加强統一行动，这无論对于爭取实现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来說，或者对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上实现真正的团结来說，都是必要的。

我們对于消除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意見分歧和加强两党之間的团结，过去曾經抱有决心，而且今天也仍然抱有决心，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各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准則，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切必要的努力。

你們的来信說：“遵循共产党人团结的神圣原則的苏共，过去和現在都尽其一切努力来消除和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責任感、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对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最大限度的关心。”这种态度也是我們一貫主张采取的；我們希望你們在任何場合都按照这种原則性的态度采取实际的行动。但是，你們一方面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表明了这种态度，而另一方面又在七月十一日的来信中說了下述一段話，并且单方面地公布了这封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的信件交給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已經三个月了。我們在信中充分地、本着同志的精神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改善两党間关系的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和建議。但是，我們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在这期間，日本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中央全会。从全会的材料中和日本共产党在这期間发

表的其他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无论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在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同意把它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的这封信故意地对他們隐瞒起来。”

我們要問一問你們，你們在四月十八日的來信中發誓要表現出的那種“最大限度的克制”，就只能保持兩個半月的時間嗎？你們所說的“最大限度的責任感”和對爭取團結的“最大限度的關心”，只不過是這樣一種程度的責任感和關心嗎？即，在遞交了包括廣泛的理論問題在內的長篇文章的“信件”之後，過了兩個半月沒有得到答復，也不問對方沒有答復的原因是什麼，就片面地武斷地認定這是“故意地隱瞞起來”，只單方面地通知我們黨就突然地公布給我們黨的非公開性的文件。難道你們認為，你們的來信對我們來說，特別可怕，包含有我們非“故意地隱瞞起來”不可的那種內容嗎？如果你們那樣認為，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只不過是毫無根據的自高自大。實際上，在你們通過塔斯社及其他機關單方面地公布了那封信以後，資產階級商業性報紙和雜誌都同時報道了這封信；反黨修正主義者內藤一伙以及你們一手努力培植起來的志賀一伙也迫不及時地在他們的機關報上轉載了那封信的全文，恨不得我們黨內以這封信為開端發生動搖。但是，那些指望我們黨發生動搖的人們的陰謀徹底破產了。你們公布這封信，絲毫也不能影響以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核心的全黨的團結；絕大多數的同志，都支持我們黨的領導機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和同蘇聯共產黨的關係問題所採取的措施。

我們當然要花一定的時間進行研究；一時還沒有作出答復的原因，我們在七月十五日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復信中已經說過，在此不再重復。另外，象我們在七月十五日的復信中明確地

指出的那样，我們党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处理你們的信，这是我們党的内部问题，完全用不着你們指手划脚。

你們說“最大限度的克制”，实际上是这样性急；你們說“最大限度的关心”，实际上是这样輕率；你們說“最大限度的責任感”，实际上却采取了这样不負責任的态度。既然如此，不管你們在来信中怎样強調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要逐步地消除意見分歧，为了加强苏联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兄弟友好关系，而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对共产党人來說，……應該站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够按字面的意思来相信你們的話是真的。你們的这种态度不是要根据原則正确地解决两党之間的分歧的态度；象在上文所說的那样，这种态度，只有那些真正妄图打击我們党，要在我們党内引起动摇，以利于把我們党变成听从你們指揮的党的人才会采取的。

事实的經過清楚地证明了你們的意图。当人們看到你們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和七月十一日的来信的內容以及你們单方面公布这些信件以前事情經過的时候，而且当人們看到你們又恰恰是在这个期間开始公开支持和鼓励由于严重違反我們党的紀律而被开除了的志賀义雄等人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时候，誰都不难判断你們的意图是什么。

你們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曾經就同我們党代表团举行会談这件事写道：“苏共中央非常重視同日共代表团的会見，希望这次会見有助于达成相互之間的諒解和制止我們两党之間的关系恶化的进程。”但是，你們一方面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談，另一方面却秘密地加紧同志賀义雄等人进行以前早就已經开始了的联系，并且着手策划分裂阴谋来帮助他們进行反党活动。而且，你們不等我們党代表团面国，便先把以你們在两党会談时所作的发言为主要

內容的四月十八日的長信送交給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到五月十五日，當國會批准和通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志賀義雄違反黨的決定投票表示贊成時，你們便立即同時開動“莫斯科廣播電台對日廣播”、塔斯社和《真理報》等宣傳機器，開始系統地發表述評和報道，公開地指責我們黨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態度，公開支持志賀等人的破壞黨的活動。

然後，你們就向我們送交了七月十一日的來信，這封信武斷地認為：“日共領導一方面起勁地攻擊蘇共，另一方面又拒絕採取任何步驟來消除同蘇共的公開分歧，回避討論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同志式的建議，甚至認為沒有必要答复我們的信”。這樣，你們就一方面公佈了對日本共產黨的整個方針和全盤工作進行了極其嚴重的指責的信件，說什麼：“日共某些領導人所持的政治立場，首先會使日本共產黨人自己遭到嚴重困難”，“日本共產黨的領導同志”的“思想理論觀念”是“同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道而馳的”，他們的“政治路線”又是“同國內的客觀條件及其進步力量的任務背道而馳的”，使“光榮的日本工人階級已取得的不小成果受到危害，破壞國內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團結，而這種團結是日本人民在其爭取本國的偉大前途的頑強鬥爭中所如此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你們又同時在七月十六日的《真理報》上，大事渲染地附上圖片介紹了志賀、鈴木等人新辦的周刊《日本之聲》，最大限度地加以頌揚說：“愛國者、人民忠實的儿子、國際主義者、獻身於和平、民主、社會主義事業的活動家的新的富於戰鬥性的機關報誕生了。”

另外，你們還在回月十八日的來信中，說什麼日本共產黨有“脫離群眾，陷於孤立”的危險，擔心“黨越來越處於孤立，使階級敵人感到高興”，裝出一副對我們黨的命運由衷地感到同志式的“憐

慮”的样子，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你们却不仅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各种群众民主运动方面，为了不仅把这些群众运动的路綫扭向“亲帝国主义”的方向，而且打击我们党，在群众中孤立我们党，同社会党、“总評”的一部分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糾合了你们领导下的所有其他外国势力，有计划地筹备并且进行了分裂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阴谋活动。为了組織对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阴谋活动进行的国际“援助”，被派往苏联和欧洲的“总評”政治局局长安恒良一，在回国后自我吹嘘地报告說：（1）他们为了对抗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要由“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会议”召开分裂大会的计划，被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和其他方面评价为“正統的计划，推进运动的正确办法”，而得到了全面的支持；（2）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答应派“强大的代表团”参加分裂性集会，即使要同时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那也是为了“打进去”，也就是要破坏大会和进行捣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社会新报》）。这个报告是真是假，虽然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以尤·茹科夫为团长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采取了象安恒报告的那种分裂活动，甚至动員了《真理报》、塔斯社及其他宣传机器，用侮辱性的詞句誣蔑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是“中国代表团及其傀儡”們的“京戏”、“巡回演出的杂技团”，并且进行了其他实在难以想象的指責，对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及其支持者日本共产党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们的这种分裂行徑和对日本群众运动的侮辱性的指責，受到了国内外的絕大多数代表的强有力的批評，而且在世界大会上完全陷于孤立。但是你们的代表团不仅不接受这种批評，反而同你们糾合的一部分外国势力一起退出了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

会，只参加了分裂大会，在全世界的人民和共产党人面前进一步暴露了你们的代表团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紧密勾结，而不感到羞耻。

你们为了攻击和打击日本共产党而要利用社会党和其他势力并且同反共分裂主义者实行“合作”的这项卑鄙的计划，在三月间举行的两党会谈中受到批评以后，你们竟然搬出了莫斯科声明中号召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的词句，企图使它们那项计划“正当化”。但是，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诡辩，也决不能使你们卑鄙的分裂行径合理化。你们的这种行径就是为了攻击兄弟党而同这个国家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结成联盟”，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也几乎是完全没有前例的。

我们明知你们同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近保持着密切的勾结和狼狈为奸的关系，在这里敢于把那些为了组织分裂日本和平运动的阴谋活动而同你们采取联合行动的人叫做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党在它的纲领中明确地把“克服共产主义”规定为它的“社会主义”的大前提。同你们合作的人，正是在他们那个社会党中为了完成“克服”共产主义的任务而一直最热心地进行活动的人。你们以他们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一贯支持和鼓励这个日本社会党的传统的反共政策的表现——在和平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同他们结成联盟，对我们党进行攻击，并且在国际上分裂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你们的这种行动使美帝国主义和我国的垄断资本势力感到非常高兴。

你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引用了莫斯科声明。但是，莫斯科声明之所以重视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实行合作，是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势力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政策，为了完成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等各项迫切的任务，而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决不是为了助长旨在分裂人民运动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我们党根据人民的迫切要求，一贯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来争取包括日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力量采取统一行动和结成统一战线。只有这种态度才符合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你们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实行的“共同行动”，却恰恰是为了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行动作为“测验的工具”，来分裂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并且破坏人民团结的“共同行动”。无论你们怎样反复地援用莫斯科声明关于“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行统一行动”这个论点，也无法为你们要无理地干涉我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结成联盟来破坏和分裂运动的这种分裂活动开脱。

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的结尾部分说：

“苏共方面基于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今后仍准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建立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很明显，看一看你们的全部行径，就知道你们的这番话是非常虚伪的。你们在说过这些话以后四个月间的行径表明，你们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要加强同日本共产党的团结和合作，而象废纸一样地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以及“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明目张胆地践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竭尽全力支援被我们党开除了的一小撮卑鄙无耻的叛徒，公然开始对我们党进行不能容忍的破坏活动。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断定，你们采取单方面地公布四月



十八日来信和七月十一日来信这种反常的行动的意图，就是：同志賀等人破坏我們党的活动相呼应，在国际方面援助他們，使我們党陷于混乱，动摇党员和人民对我們党的领导机构的信任，使我們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破坏我們党的领导机构的威信。你們現在已經陷入了为了打击我們党而不择手段的地步。

你們的这种行徑，同你們所說的要加强两党之間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那些話，是絕對不相容的。我們认为，你們的行徑是完全沒有可以辯解的余地的，只要你們不立即停止破坏我們党的活动，并且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来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評，你們就沒有資格来談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問題。

如上所說，你們今天正在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制造一种复杂的、困难的形势，这种形势在两党之間的兄弟般合作的悠久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而且，我們不得不特別重視的是，你們的所作所为是这样一种行徑，即：一个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对那些在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依靠暴力进行的独裁統治日夜进行着激烈斗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公开进行中伤、攻击和干涉内部事务。而且，你們是利用我国政权还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这个情况来攻击我們党的。例如，你們明知大部分的宣传机器是处于同美帝国主义保持着从属性同盟关系的日本垄断資本控制下这个事实，却单方面地公布你們指責和攻击我們党的信件，并且接見記者，发表声明，向他們提供用来进行反共宣传的新武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当然，我們党决不害怕这种攻击。我們确信，你們的这种践踏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沒有道理的做法必然遭到失敗。你們越是热中于搞这种阴谋活动，

你們的这种錯誤态度，就必然越来越受到日本的革命群众更加严厉的批評。同时，这种情况已經使竭尽全力攻击我們党的美帝国主义、日本垄断資本势力以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分子感到高兴，帮助了他們进行反共攻击。这个事实，最雄辯地证明了：你們對我們党的指責和攻击完全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背离了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制訂的、号召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团結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我們从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結这个观点出发，呼吁你們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不再去进行任何硬要我們党和其他兄弟党接受錯誤观点的工作，立即停止對我們党进行的无理的攻击和干涉，并且由两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恢复和加强两党之間的坚强团結。

我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从世界人民运动的伟大发展的悠久历史來說，日本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具有四十年傳統的兄弟般合作关系的这种恶化，到底是一个暫时的現象。这是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無論暫时发生什么样的复杂而困难的情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說的生命力必然能够克服其暫时的困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然能够克服目前的这种不团結現象，并且取得更坚强、更巩固的团結，向着新的胜利大踏步地前进。

我們將坚定不移地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忠实地遵循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各项革命原則，为国际共产主义取得真正的团結和发展而奋斗。同时，我們將一面坚决粉碎對我們党进行的一切无經的干涉和搗乱的阴謀，一面在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今后仍然坚持不懈地

努力,以便在我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也实现真正的团结,并且发展日苏两国人民在反帝以及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友谊和团结。

此致

共产主义者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七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杂志《党的生活》在最近一期上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件。它的内容又通过塔斯社、莫斯科广播电台等发表出来，并由日本商业报纸、广播电台加以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既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信件，那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决定公布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五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十九日发表的本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全文如下。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赤旗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七月十四日收到了你们七月十一日的来信。

对于你们在这封信中对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第一封信以后经过了一年，才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但是，在这期间由于有地方选举和众议院选举，而且，野坂主席和宫本总书记不能去莫斯科，因

此，两党会谈的时间有所延迟，这只要看一看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不就很清楚了吗？我们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表示希望你们以某种方式派代表团到日本来。你们曾经表示在原则上赞成派自己的代表团到日本来，但又表示担心日本政府是否会准许入境。因此，我们才派以袴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完全了解这种情况，而竟然故意指责我们，说我们过了一年还没有派代表去。

你们说，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时，避免坦率的协商，并且拒绝讨论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的问题。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你们在同我们的来往信件中，表示特别重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建议讨论包括这个条约在内的双方关心的问题。事前完全没有商定要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所以，我们党代表团主要是根据下述任务到莫斯科去的，以两党之间直接发生的问题为中心，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同你们进行协商。而且，我们党代表团非但没有拒绝讨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问题，反而联系到国际民主运动的问题，表明了我们对一系列共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这从会谈的经过情形看来，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我们党不但没有任何理由回避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反而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个共同斗争，这是你们很了解的。

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我们党建议，尽管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意见分歧，仍然应当在执行当前的共同任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发展共同斗争，这个任务是根据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方向一致确定的。这就对大会的成功

作出了貢獻。

而且，我們黨中央政治局在六月二十日發表題為《召開各國共產黨的国际會議，不應該是為了分裂，而應該是為了真正的團結》的聲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國際民主运动的團結，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宮本總書記七月九日在紀念日本共產黨成立四十二周年集會上發表演說，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我們認為，即使不能最後地解決關於原則問題的公開爭論，也能够根據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爭取共產黨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在當前的統一行動這一點上取得一致的意見。這就是說，只要是一個共產黨人，都應當反對美帝國主義對老撾、越南的侵略戰爭。只要是一個共產黨人，不論是誰，都應當反對美國核潛艇侵略各國港口的陰謀，反對它帶着污染海水的危險到處亂闖。只要是一個共產黨人，不論是誰，都應當贊成全面禁止核武器。而且，只要是一個共產黨人，就當然地要熱烈支持民族解放鬥爭。”

對於我們黨的這些建議，你們也是很了解的。

我們黨代表團沒有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個問題全面地發表意見，是因為我們黨的領導方面沒有給予這樣的任務。從上述通過我們同你們的來往信件而舉行會談的經過情形看來，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並且因為，我們黨的領導方面認為，首先從兩黨間直接發生的問題開始討論，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是切合實際的。而且，我們黨代表團在會談開始和會談結束時，難道不是曾經表示過，這次會談是第一次會談，以後還準備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個問題嗎？你們不也曾表示贊成我們黨代表團的這個意見嗎？

只能認為，你們所謂我們黨代表團“避免坦率的協商，並且拒絕討論反對共同政人的共同鬥爭的問題”這種說法，是完全歪曲了事實的蓄意對我們黨進行的誣蔑。

你們还指責說，我們党代表团拒絕簽署聯合公報。但是，我們党代表团所以沒有贊成起草聯合公報，是因為，就象他們在莫斯科對你們所說的那樣，如果如实地宣布會談的內容，那就会把分歧暴露敵人面前，如果宣布和會談內容相反的情況，那就等于欺騙我們党的黨員和日本的劳动人民。而且，你們企圖把同會談內容完全無關的聯合公報草案強加給我們，所以我們党代表团沒有贊成發表聯合公報。指責我們党沒有贊成同你們党發表聯合公報，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

你們說，“在莫斯科兩党會談以後，日本共产党變本加厲地攻擊了苏联共产党。”但是，正是你們，早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在《真理報》發表的茹科夫的文章中，就公開攻擊了我們党，接着，又變本加厲地進行了公開的、無原則的攻擊。

當我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會談的時候，你們便秘密地進行活動，同志賀義雄等人加強在這以前就已經開始了的聯繫，鼓勵和援助他們的反黨活動。現在，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當志賀義雄和鈴木市藏公然踐踏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宣布對我們党進行破壞活動時，莫斯科廣播電台和《真理報》便立即全面支持這伙叛徒。而且，你們故意不讓讀者和聽眾知道那些表明我們党中央委員會為什麼開除他們出黨的決議和決定。莫斯科廣播電台對我們党的國會議員團公然進行了中傷。我們党對此加以駁斥，是我們党作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處於獨立平等的地位的党所不得不採取的措施。

這些昭然若揭的事實表明，在兩党會談以後，正是你們，對我們党開始進行了最露骨的難以寬恕的直接干涉。這件事情證明，在莫斯科會談時，我們党代表团特別重視你們干涉我們党的問題的這種做法，是非常妥當的。

你們說，我們沒有向我們黨的黨員和受我們黨影響的團體介紹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文件。然而，我們廣泛地發表了你們的重要文件，包括同我們黨的立場和觀點不一致的文件在內。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與此相反，正是你們，在很久以前就連我們黨的重要的決議和聲明都不讓蘇聯黨和人民知道了，難道不是這樣嗎？你們所要求的，歸根到底，就是要我們單方面地公布你們的文件，要我們無條件地服從你們的立場和觀點。但是，你們無權向我們黨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黨作為一個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獨立自主的黨，堅決拒絕你們這種無理的無原則的要求。

你們指責我們黨說，我們會要“科學社”向它的分店“發出了銷毀蘇聯文件的指示”。我們黨中央沒有向“科學社”發出那樣的指示。而且，我們黨也不會過問“科學社”的營業方面的事務措施。不管怎樣，你們甚至把“科學社”這樣一個日本公司的業務措施方面的“情報”也收集起來，並且用來攻擊我們黨，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我們黨聯系到全蘇國際圖書公司處理日本的文件的情況指責你們，那你們會怎樣說呢？

你們在這次來信中措責我們說，蘇聯共產黨四月十八日的信件已經發出三個月，然而我們還沒有作出答復。我們黨代表團是在四月三十日回國的。我們黨的領導方面當然要等代表團回國，听取他們的匯報，並且要等因病療養的宮本總書記回國，充分研究以後，答復你們。但是，在承擔着在資本主義世界同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進行鬥爭的任務，工作非常繁忙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只埋頭研究怎樣答復你們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信件。而且，你們的信件內容廣泛地談到了理論問題，因此，準備答復當然要花費一定的時間。現在，我們正準備答復你們的信件。你們片



面地断定我們不会提出答复而指責我們党，这完全是武断的态度。

你們在这封来信中說，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沒有討論你們的信件。我們要問，这究竟是根据什么人的情报而作出这种断定的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管怎样，我們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討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和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問題，是我們党的內部問題，不是你們所應該过問的。

你們在这封来信中說，你們已經决定发表你們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的来信。

正象你們也知道的那样，双方曾經互相商定，不公布日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談的內容。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慣例來說，会談的內容还包括有不應該公布的問題。你們违反这个協議和国际慣例，竟然单方面地公布了你們关于日苏两党会談內容的信件，其目的何在？只能认为，这是为了向在美日反动势力的掩护下攻击我們党并破坏日本革命运动的志賀一鈴木一伙及其他反党分子提供中伤我們党的材料，为了對我們党进行破坏活动。

你們甚至在这封来信中又把自己說成似乎是一貫捍卫莫斯科声明的原則、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进行努力的，但是，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會議进行坦率的同志式的討論以后，各兄弟党一致通过了声明。从那以后不到一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违反莫斯科声明，开始挑起公开論战的，不正是你們嗎？那是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的令人担忧的局面的最重大的契机，难道这不是非常明显的嗎？

开始公开攻击我們党的也是你們。是你們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真理报》发表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开始指名攻击我們党。而且，你們还通知我們說，你們要单方面地发表給我們党的不公开

的文件。

单从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则，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最大责任，是在你们方面。你们说我们党背离了莫斯科会议一致作出的决定。但是，背离莫斯科声明的原则的正是你们。不对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进行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攻击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无论假借什么样的口实，最后只会进一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六月二十日发表了题为《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为了真正的团结》的声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提出了旨在根据原则加强团结的积极建议。

我们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莫斯科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今后仍将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争取实现真正的团结。同时，我们坚持这种态度：坚决不容许对我们党进行无理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是来自哪个党的。

致以共产党人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

# 在日苏两党举行会谈以前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三封复信

由于苏联共产党单方面地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和七月十一日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所以日本共产党在十九日发表了七月十五日的党中央复信。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七月十五日的复信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共产党单方面地发表的两封信，尽是对日本共产党的一连串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日本共产党准备对此进行必要的答辨，现在先发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去年三月六日、十月二十二日和今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以驳斥苏联共产党关于直到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时为止的经过情形所提出的无理指责。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赤旗报》)

##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你们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们党中央委

員会政治局慎重地研究了你們的來信，并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一)我們为了根据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則，进一步加强兩党的兄弟般的联系，对于你們表示願意邀請我們党代表团到苏联，就双方所关心的一切問題进行協商的建議感到高兴，并原則上贊成你們的建議。

我国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底的期間，举行各級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發生的問題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們还預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我們考虑到我們党所面临的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作完四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們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問題，向你們提出关于这个問題的具体答复。

(二)正如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七日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我們党认为，在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最重要的是解决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間的意見分歧和不团结問題。

我們衷心希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尽早地举行会談，使这个会談在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則、同志式地解决爭論問題方面，取得根本性的成就。

另外，还收到了你們表示願意邀請我們党的活动家到苏联参观和休养的來信。感謝你們的关怀。关于这个問題，我們也将在地方选举以后把具体計劃通知你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十二日的来信。我们慎重地研究了你们的来信以后，决定提出如下的答复。

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所表示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继续加强和发展同我们党的传统的兄弟般的关系的这一愿望。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再次表明我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因，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的愿望。

我们曾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答复说，原则上赞成你们表示邀请我们党代表团到苏联，讨论双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的建议。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我们在那封信中，考虑到地方选举和预定今年秋天举行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曾经表示，关于派我们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的时间，另行决定。但是，你们在这次来信中却写道，似乎我们曾经表示要在今年内派代表团。我们认为，这是你们的误解。后来，形势转变，众议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们党就延期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议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们所了解的。

就象在今年五月举行的六中全会已经决定的那样，在大选之后，必须进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间自不用说，就是在直到明年五、六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间，也不

可能出国旅行。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們希望你们考虑到，在上述情况下，从我們党的情况来说，目前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们派你们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你们的来信联系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对我们党的政治局声明和《赤旗报》社论表示遗憾。我们认为，在两党会谈时，就这个问题充分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不过，我們想暂且简单地说明我們党的立场。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不仅是国际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的国内问题。这个条约，不仅由苏、美、英三国商谈并且签订，而且还要求其它国家的政府参加。因此，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这个条约，并在上面签字的态度。而且，在日本的国会会议上，这个条约也成为讨论的对象。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从我們党逃跑出去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正在散布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看法，并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测验的工具”，在群众运动中制造分裂。

在这种形势下，我們党从支持世界的真正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表明独立自主的看法，是我们党的责任，也是我们党的义务。

我們党承认，在核试验的物理方面的损害这一点来说，当然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但同时，我們党反对那种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等量齐观的错误观点。我們党从这个立场出发，一贯坚决地反对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民主社会党、社会党、背叛和逃出我們党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们在

前年苏联政府恢复核試驗以后大肆展开的所謂“抗議苏联核試驗”的运动。

我們和日本人民都希望核試驗对大气层的污染有所减少。但是,日本人民的根本希望是不再重演广島和长崎的悲剧。

我們党的綱領反映出日本人民的这个要求:“党要为爭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軍而斗争。”“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結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关于核試驗問題,我們党一贯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試驗。去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宣言也說:“所有核国家立即无条件地締結禁止核試驗的協議。”另外,在去年莫斯科举行的“爭取普遍裁軍与和平世界大会”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也要求一切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締結一个永远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間、地下和水下的一切核試驗的条約。因为,只有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核試驗,才能在限制发展核武器和阻止准备核战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們从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立場出发,虽然理解那些认为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将会减少放射性物质对大气层的污染而支持这个条約的人們的心情,但是,我們不能支持事实上沒有从根本上限制美帝国主义发展核武器和准备核战争的这个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美日反动势力正在策划让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并且把可以装载氢弹的F-105D型飞机运入日本,把日本作为基地,加紧准备在亚洲进行核战争。对于我国的这种现实,我們不能不加以正視,也不能不独立自主地决定对这个問題的态度。

我們在这儿还想談一談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有

关問題。你們也知道，尽管在这届大会的国际會議上，与会的各国代表团就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及其他問題展开了激烈的爭論，但是仍然全体一致通过了以当前一致的任务为依据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我們在考虑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况的时候，对世界大会的这一成就給予了积极的評价。世界大会刚刚結束，茹科夫同志就訪問了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野坂同志表示不能同意茹科夫同志关于我們党代表团在大会上的活动的談話，并且提議在两党代表团会談时再討論这个問題。茹科夫同志也表示贊成这一建議。

但是，茹科夫同志回国后便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这次世界大会的文章，公然指責了我們党。我們根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則，从在独立平等基础上維護兄弟党的团結的立場出发，认为这是令人遺憾的。

另外，我們党殷切地希望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則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因此，我們希望繼續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談。而且我們还希望在各兄弟党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举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會議。

致以兄弟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們收到并研究了你們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我們单就你們提出的一些問題答复你們。

我們对于你們說准备在日本当局准許訪問的情况下派你們的同志到日本来这件事，表示欢迎。

日本政府虽然曾經拒絕批准兄弟党的代表入境参加我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在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曾經准許你們的代表入境，而且最近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准許了包括你們的同志在內的苏联的各种代表团入境。但是，过去日本政府也曾經拖延批准你們的同志訪問日本，或者沒有准許特定的同志入境。因此，由于象我們在上次信中所說的那种理由，在目前我們也不可能派遣以野坂同志和宫本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可是，我們还在研究派遣由其他同志組成的代表团的 possibility。

你們的来信說，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以所有兄弟党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會議上通过的文件为指导的。

但是，据我們判断，在两次莫斯科會議所通过的所有文件的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可以为肯定不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提供根据的詞句。我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美国政府早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便提出要簽訂不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而我們同你們一起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呼吁“坚决反对核炸弹和其他同样装置的一切試驗”（《告世界人民书》），即要求全面禁止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核武器試驗。而且，你們也在长

时期内正当地坚持正确的主张，說美国政府关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建議是欺騙和平力量的建議。

你們为了給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的意义提供根据，还強調說“世界上的絕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这个条約。但是，如果要談論国家的数目，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情况：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数的国家基本上仍然是資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許多国家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問題上都是附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我們希望你們首先考虑，为什么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贊成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

对于我們針对我国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流派把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作为“測驗的工具”来分裂和平运动的活动所发表的意見，你們說什么只要我們日本共产党贊成这个条約，問題就会解决。但是，我們确信，把支持这个条約作为今天和平运动的前提的做法本身，就是完全不正确的。我們认为，这个条約之所以会被各种流派利用来作为“測驗的工具”，这同它本身的性质难以肯定这一点不是沒有关系的。

我們党已經在七中全会決議和一系列的文章中表明了我們对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問題的观点和态度，这里不再重述。

另外，你們的来信还說，茹科夫同志的文章並沒有指責我們党。但是，茹科夫同志的文章是这样說的：

“必須注意到，不考虑日本社会中广大群众的意見，而試圖否定……締結莫斯科条約的积极意义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也是唯中国代表团之命是从的。”

我們不能不认为，在这儿所說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們党出席了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会的代表团。

在世界大会結束以后，茹科夫同志訪問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就

我們党代表团在世界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了指責。我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同志对他說，我們党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針，并且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貢獻。野坂同志还說，关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問題的意見分歧，也願意在以后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談时进行討論。尽管如此，茹科夫同志却絲毫沒有談到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內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的积极意义，而公然指責了“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我們党的許多党员和熟悉日本的和平运动的情况的人們，根据前后文意判断，认为“一些日本共产党员”是指我們党参加世界大会的代表团，我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圍繞着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及其他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們不参加討論，退出大会，举行了只有他們参加的少数人的分裂集会。尽管如此，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內的所有外国代表和日本絕大多数的代表維護了大会的統一，并且一致通过了決議。前面也已經談到，我們对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并且认为这給国际民主运动創造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們认为，在这一点上來說，我們党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貢獻。

我們願意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代表团会談中，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同你們討論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双方所关心的問題。

致以同志的敬礼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